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23期（民國113年3月），83-13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從《塘沽協定》看中、日兩國在華北的攻防*

黃自進**

摘　要

1930 年代中、日兩國在華北的攻防，以 1933 年 2 月 23 日日軍進犯熱河為起點，對於日軍為何要發動熱河戰役，史學界有不同的解讀方式。為解析日軍侵華政策的論述脈絡，本文首先從關東軍的視角，解釋日軍發動熱河戰役之始末，再以國民政府何以不能在戰前解除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職位為線索，探討華北地區蔣介石與張學良、湯玉麟之間的利益共生關係，藉此解析國民政府在熱河戰役失利的前因後果。嗣後再聚焦於張學良的解職、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對長城各關口的攻防部署，進而論述中央政府進駐華北以及國軍在長城各關口的奮戰經過。最後，再以蔣介石在落實抗日攘外政策上對地區適用順序的不同考量，以及日本政府與軍部之間在對華政策上的異同為主，探索何以扮演緩衝角色的黃郛能成為中、日兩國政府皆可以接納的華北新領導，並評析《塘沽協定》為蔣介石爭取備戰空間與時間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 蔣介石、黃郛、塘沽協定、熱河戰役、長城保衛戰

---

* 收稿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 年 11 月 17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　言

1933 年 5 月 31 日中、日兩國軍方於塘沽所簽訂的停戰協議，[1]終結了兩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軍事對峙關係，亦讓關內外恢復交通來往。但因將冀東地區設爲兩國軍事緩衝地帶，國軍不准進駐，不僅使得冀東 22 縣實同淪陷，日本的侵略也由東北擴及於華北。

《塘沽協定》既爲關東軍開闢了進軍華北的大門，將該協定的性質定位爲喪權辱國，[2]並將整個簽訂協定過程視爲是對日妥協外交一環的論述，[3]自此就成爲學術界的主旋律。然將《塘沽協定》單純視爲城下之盟的既有研究，顯然未能掌握該協定在抗日戰爭史上所蘊含的歷史意義，以及該協定對日後兩國走向所發揮的具體影響。

1930 年代的日本，原本就是一個軍方奪權、憲政體制瓦解、暗殺橫行的脫序年代。國內的動盪不安，反映到外交層面，無非就是令出多門，軍方及外

---

1 《塘沽協定》全文：
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之地區，爾後不越該線而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爲。
日本軍爲確認第一項之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以行視察，中國方面對之應加保護，及與以各種便利。
日本軍如確認第一項所示規定，中國軍業已遵守時，即不再越該線追擊，且自動概歸還於長城之線。
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以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右述警察機關，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團體。
本協定蓋印之後，發生效力。

2 江紹貞，〈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貴州社會》，1984 年第 2 期，頁 65-72；張金亮，〈試析《塘沽協定》的簽訂〉，《齊魯月刊》，1990 年第 3 期，頁 16-20；明珠、劉春英，〈長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對日交涉〉，《長春師範學院》，2002 年第 3 期，頁 36-39；金以林，〈論長城抗戰〉，《團結》，2005 年第 4 期，頁 15-22；黃民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輿論界對《塘沽協定》及其善後談判的反應〉，《社會科學論壇》，2017 年第 3 期，頁 70-77。

3 劉國新，〈《塘沽協定》與「華北自治運動」〉，《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頁 199-211；肖前，〈塘沽協定簽訂前的中日談判〉，《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頁 228-243、轉頁 166；李鳳琴，〈和戰之爭與《塘沽協定》〉，《陰山學刊》，2005 年第 4 期，頁 18-23、轉頁 27；左雙文，〈《塘沽協定》後蔣介石的對日妥協外交〉，《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6 期，頁 115-122。

務系統相互爭取對華政策的主導權，而各自內部也是派系林立，相互傾軋。然相較於日本國內的動盪不安，中國國內秩序的混亂程度猶有過之。除了長年的國共內鬥，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內部亦有南京派及西南派之爭，對華北地區，更是欠缺實質的管轄能力。是以，一部 1930 年代的中日關係史，也是一部多方勢力相互競逐的鬥爭史。在雙方國內政爭不斷的情況下，也讓兩國政府的對峙，已非單純的國與國之間的侵略與反併吞鬥爭，更廣泛地涉及兩國國內各派系之間爭奪政治主導權的存亡之戰。參與角色眾多、局勢詭譎多變，實爲此一時代的主要風貌。

有鑑於此，本文首先從關東軍的視角，解釋日軍發動熱河戰役之始末。再以國府何以不能在戰前解除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職位爲線索，探討華北地區蔣介石與張學良、湯玉麟之間的利益共生關係，藉此解析國府在熱河戰役失利的前因後果。嗣後再聚焦於張學良的解職、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以下簡稱北平軍分會）對長城各關口的攻防部署，進而論述中央政府進駐華北以及國軍在長城各關口的奮戰經過。最後，再以蔣介石在落實抗日攘外政策上對地區適用順序的不同考量，以及日本政府與日本軍部之間在對華政策上的異同爲主，探索何以扮演緩衝角色的黃郛能成爲中日兩國政府皆可以接納的華北新領導，並評析《塘沽協定》爲蔣介石爭取備戰空間與時間的歷史意義。

二、華北權力架構的多元化及熱河戰役的失利

熱河早在關東軍籌建「滿洲國」時期，就已被視爲獵物，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熱河在張作霖執政時期，就已與東北其他三省，形成共生關係。[4]尤其是 1928 年 12 月，張學良欲歸順中央，在商議「易幟」問題時，熱河也是他與國府商議集體交易的一環。[5]這亦是熱河省爲何會與其他三省同時改制之緣

4 早在 1921 年 9 月，奉軍因支援直系大勝皖系有功，奉系的第 28 師師長汲金純得以入駐熱河，並至 1922 年 5 月期間出任熱河都統。爾後因直奉大戰，奉軍失利，奉軍一度退出熱河，但 1926 年 4 月，奉軍在湯玉麟領銜下，又再度返回。自此熱河就成爲奉軍的勢力範圍。

5 〈奉吉黑熱宣布易幟〉，《申報》，1928 年 12 月 30 日，第 4 版。

由，而湯玉麟也在張學良推薦下，除了出任熱河省主席外，[6]亦得以兼任國民黨熱河省黨務指導委員。[7]易言之，在國府北伐後所建構的新政治體系中，所謂「東北政務委員會」所統籌管轄的區域中，原本就包含熱河省。其二是以軍事防禦角度言，唯有納入熱河，才能順勢將長城納為己用。長城掌控關內外交通要道的 11 個主要關隘中，就有 7 處是位於熱河省境內。[8]相較於熱河與遼寧省之間平坦寬闊高地的無險可守，從平原地帶的河北省進入高原地帶的熱河省時，長城反而可成為防禦屏障。這亦是關東軍在籌建滿洲國時，堅持要將熱河納入國境之內的原由。

基於上述考量，關東軍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其參謀部門於 9 月 21 日所提出的「滿蒙問題解決案」，就將熱河省省主席湯玉麟與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北邊鎮守使署張海鵬、東邊鎮守使署于芷山及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並列為第一批急需安撫的地方首領。[9]對於關東軍的招安，湯玉麟是即刻響應，並於 9 月 29 日正式宣告獨立於國府之外，[10]表達正式投入滿洲新建國運動之意願。此後他更是熱衷參與建國的籌備活動。例如，1932 年 1 月 15 日派遣代表參與張景惠、臧式毅、熙洽、張海鵬等人所主導的新國家建國會議，會中並達成共同籌設「東北行政委員會」之決議。[11]同年的 2 月 18 日，湯更與上述委員聯名簽署，宣布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同時，還正式發布「從此與黨國政府脫離關係，東北省區完全獨立」之宣言。[12]對於他

6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函國民政府為本會議決任命湯玉麟邴克莊梁國棟李元箸金鼎臣佟兆元為熱河省政府委員指定湯玉麟為主席並任命邴克莊兼民政廳長錄案請任命」（1928 年 12 月 26 日），〈熱河省政府官員任免（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典藏號 001-032220-00174-002。

7 東北文化社年鑑編印處編，《東北年鑑》（瀋陽：東北文化年鑑編印處，1931），〈黨務〉，頁特 2。

8 位於熱河省境內的是冷口、董家口、鐵門關、喜峰口、潘家口、羅文峪及古北口；而位於河北省境內的是山海關、九門口、義院口及界嶺口。

9 片倉衷，〈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收入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編（下略），《現代史資料（7）：満洲事変》（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頁 189。

10 國務院統計處編，《滿洲國年鑑》（新京：川口印刷所，1933），頁 18。

11 臧式毅時任遼寧省省主席。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冊 3，頁 128。

12 國務院統計處編，《滿洲國年鑑》，頁 20。

在建國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無役不與，關東軍自是充分肯定。同年 3 月 10 日所公布的滿洲國執政名單，他榮任參議府副議長，[13]更爲雙方的融洽關係提供最眞實的見證。

（一）蔣介石與張學良、湯玉麟之間的利益共生

面對湯玉麟的公然通敵，國府自是不滿；然因鞭長莫及，只得靜待其變。好在湯玉麟與滿洲國的往來，只局限於表態層面。湯氏除了沒有入新京接任新職以外，也沒有容許日本軍方勢力進駐熱河。故熱河的實質管轄形式，並沒有任何改變；而他與國府在華北的最高軍事政治統治機構「北平政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政務會），仍維持原本行禮如儀的來往模式。他對於 1932 年 1 月 30 日被任命爲該委員會委員一職之事，也是欣然接受。而他與該會常務委員兼北平綏靖主任的直屬長官張學良之個人往來，則因九一八事變後休戚與共的共生關係，反而較前更加密切。

張學良因東北棄守，大部嫡系部隊入關，[14]軍費支出浩大，爲彌補空缺，特與湯玉麟達成在華北地區公開販賣鴉片協定。根據日本參謀本部的調查，湯玉麟在熱河的主要營收，是來自種植鴉片。他讓其長子湯佐輔[15]擔任軍需總辦，並利用熱河興業銀行，一手掌控全省的鴉片買賣。九一八事變以前，年收可達一千二百萬，其中七、八成的盈利是來自瀋陽方面，二、三成是來自平津兩市。然因事變之後，原本銷售瀋陽之途已斷，故亟思擴大在平津的市場，以求增補收入。

新協定是在 1932 年 2 月 21 日生效，故擴大市場的方法，主要是「化暗爲明」。原本的經營模式是由熱河省駐平辦事處負責私下買賣，而河北省政府及北平市公安局提供暗中保護。湯玉麟以每兩鴉片 20 錢的額外規費，向上述兩

13 原特區長官張景惠則擔任參議院議長。國務院統計處編，《滿洲國年鑑》，頁 33。
14 九一八事變後，入關者有獨立步兵第 7 旅、第 12 旅、第 19 旅、第 20 旅及獨立騎兵第 3 旅等。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頁 157-164。
15 湯佐輔實爲次子，長子爲湯佐榮，時任省「禁煙局」局長。

個機構繳納後就可通行無阻。如今，爲擴大市場，雙方協議改採開放直營，任何行號，只要直接向北平綏靖公署以每兩 40 錢的行情繳納稅額後，就可取得公開販售執照。按參謀本部計算，新舊方法之別，在於新法可爲張學良每月增收 200 萬元。這不僅佔張氏固定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剛好可以補足他入不敷出的金額。[16]

對於湯玉麟左右逢源、腳踏兩條船的作法，國府自然不願長期漠視。因而當 5 月 5 日上海停戰協定簽定，蔣介石稍有餘暇可重新思考北方防務時，熱河問題就成爲他急欲布局的要務。

同年 6 月 15 日，針對此一議題，蔣在廬山與行政院長汪兆銘、外交部長羅文榦商議，並取得共識後，決定要主動出擊。他並在當日日記記載了他的決心：「余決心囑漢卿先解決湯玉麟，佔據熱河，一面與東三省各義勇軍可以打成一片，一面可以威脅山海關，令倭寇使之不敢窺竊平津，救國禦日之道，莫此爲要。致函漢卿，督促其實行之。」[17]

然對蔣的要求，張無意全盤遵守。身爲東北軍大家長，主張東北軍的事務，應按東北軍的內規來處理，是其在檯面上的說詞。張湯兩人的鴉片買賣，對他而言，是不可輕易放棄的財源。故他在得到湯玉麟絕不投靠「滿洲國」的保證以後，兩人之間即刻達成以下協議：湯允張嫡系的第 7 旅及第 16 旅借道熱河，[18]進入遼寧省境內；張則保證對湯既往不咎。對張來說，嫡系部隊的借道，代表熱河省已納入編制。能達成此一協議，他已心滿意足。尤其是九一八事變時期原不及撤退的東北軍，大部分化成東北義勇軍，仍留在東北打游擊。東邊的山海關，西邊的熱河省，是關內支援東北義勇軍兩條主要補給路線。[19]是以，

16　按日本參謀本部的調查，張學良除要統籌東北軍的各項支出以外，察哈爾及熱河省的開銷，也需他負責。前者每月 80 萬元，後者每月 100 萬元，而東北軍的開銷是 350 萬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開銷，合計總額是 600 萬元。然他實際收入，每月只有 400 萬元，故他每月皆虧欠 200 萬元。參謀本部編，〈支那時局報：第 57 號・北支及中央／財政概史〉（1932 年 5 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參謀本部-上海事件-S6-1-57，頁 1-2。

17　〈蔣中正日記〉，1932 年 6 月 15 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下略）。

18　《大公報》，1932 年 7 月 25 日，第 3 版。

19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頁 96。

能掌握熱河省的補給通道，並得將四萬餘人的東北軍及時改編成義勇軍，投入東北淪陷區的敵後游擊戰，[20]張已心滿意足。這是張湯之間能達成協議的主因。

然而，從蔣介石立場言之，倘不能直接控制熱河，便一日不得安心。同年 7 月 8 日，他特地向張學良提出以下作戰方案：首先囑張學良利用夜間，派遣三個旅進駐熱河附近；爾後中央軍也隨即開拔到熱河，待兩軍完成挾擊部署態勢之後，再將湯玉麟左遷到察哈爾省。[21]雖然蔣介石曉以大義，但張學良拒不回應，對湯玉麟遲遲不肯下手。為此，蔣介石在 7 月 20 日的日記中，特別記載此事，謂張學良「其罪誠等於賣國矣，痛恨之至」。[22]

至於關東軍方面，當知曉湯玉麟為開拓財源，而與張學良共同經營華北鴉片之後，為防止湯氏又改投回張氏陣營，關東軍司令部特於 4 月 4 日，擬定一份安撫與備戰兩套並行不悖的策略。前者是即刻恢復熱河鴉片銷往遼西的既有管道，以便確保湯氏個人收入，不會因他投向滿洲國而有實質上的財務損失。其次，在備戰方面，則是整修通遼與開魯之間的公路，以及開始整備錦州到北票之間的鐵路，尤其是在北票與朝陽之間敷設輕便鐵路，以便日後運兵。除此之外，還計畫在朝陽、赤峰、開魯、承德等地建設飛機航站，以及派軍進駐開魯及北票等地。[23]

當關東軍對如何處理熱河仍遊走於戰與和之間時，顯示解決熱河事務還不是當務之急。對關東軍而言，如何應付東北境內風起雲湧的義勇軍，才更是要務。然令人惋惜的是，當關東軍正全力應付東三省境內的義勇軍，[24]尚無餘力

---

20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集（下略），《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 3．日中戦争（上）》（東京：朝日新聞社，1962），頁 4。

21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4），冊 15，頁 371-372。

22 〈蔣中正日記〉，1932 年 7 月 20 日。

23 〈對熱河政策〉（1932.4.4），收入稲葉正夫、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編（下略），《現代史資料（11）：続・滿洲事変》（東京：みすず書房，1965），頁 788。

24 依關東軍統計，反日勢力可分成兩大類：一為義勇軍，另一為盜匪。義勇軍於 1931 年年底時最盛，人數約為 17 萬人，1932 年時已降為 10 萬人左右，1933 年時只剩 2 萬 5 千人，到 1935 年時已不到 1 萬人。至於盜匪，以 1932 年時最盛，人數約 6 萬 9 千人左右，到 1937 年時已降至 6 千人左右。小林英夫，〈日本の「滿洲」支配と抗日運動〉，收入野沢豊、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8），卷 6，頁 226。

插足熱河事務之際，國府方面反而因汪精衛與張學良之間的內鬥，而讓中央與地方的精力皆浪費在如何穩定政局。政潮的起因，表面上是因汪不滿張學良的索求無度，例如 1932 年 8 月 6 日，汪氏致張學良的通電解職的電文：「……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二百萬；所責於鐵部者，即籌二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矣。……弟誠無似，不能搜括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於弟，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爲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惟兄裁之」。[25]

張接到電報後，除於翌日召集北平政務委員會談話會決議電汪辭職以外，8 日還正式具狀國府「即請罷免北平綏靖主任現職，簡賢擔任」。面對汪、張兩人的雙雙請辭，時在漢口，正在全面策劃豫鄂皖三省剿共軍事的蔣介石，則決定以挽汪回任爲優先。在此一思維下，國府批准張學良辭職，並開始著手調整北方政治機構及人事，裁撤北平綏靖公署，改設由蔣氏自兼委員長的北平軍分會。此外，也讓平津衛戍司令于學忠與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樹常之間的職位互調，以及將原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翼飛免職，改任命宋哲元等人令。[26]

讓中央政府可以象徵性地參與華北政治，以及讓宋哲元出任察哈爾省省主席，[27]可謂是此次北方調整人事布局的重點。然對奉系而言，此種使張學良已無實質頭銜的安排，無非就是爲了袒汪抑張。爲求反制，奉系一舉串聯了 57 名北方將領，並唆使新貴宋哲元領銜，萬福麟、于學忠等人聯名通電表示願與張氏共進退。[28]

25　〈汪精衛昨晨來滬．突然呈請中央辭職〉，《申報》，1932 年 8 月 7 日，第 13 版。
26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頁 24-25。
27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 14-26。
28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3，頁 185。

面對北方將領的全面反彈，蔣介石特於 20 日電張學良，告以他本人雖兼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但不克常川駐平，仍請張學良代理，職責權力均仍舊。對於此一安排，在張學良表態願接受新職位後，華北的政潮因而得以告一段落。[29]

對於汪、張之爭，輿論可謂是一面倒的聲援汪兆銘，例如胡適在《獨立評論》就公開爲文表示：「我們很贊成張先生的辭職。」[30]《大公報》的天津版，則於政潮發生的第二日，就在社評上公開呼籲，張氏「應自動以去」。[31]《申報》則以「工商界對汪魚電應聲，紛紛責難張學良」的專題報導方式，引述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出版業公會、上海市轉運同業等不同公益團體的通電，聲援「汪院長言詞奮激悲壯，深得我民眾心腑」的同時，對張學良則是大加撻伐，文中還不忘譏諷：「聖賢盜賊，別於一念，何去何從，惟鈞座擇之」，不齒之情，溢於言表。[32]

然對於汪、張之爭，身爲廟堂重鎮的蔣介石，卻是另一番感受。尤其是國難當頭，爲了不讓外敵與內患有機可乘，他第一時間就須穩定政局，不讓政潮擴大。故他於 8 月 6 日接汪辭行政院長職之電後，特於翌日致電汪表達慰留，曰：「奉魚電，不勝悵惘。同時於漢報得閱致漢卿電，乃知辭職原因。此事不成問題，何煩爲此？若兄欲一去以作士氣而振紀綱，則弟無不同情，亦弟所共願也。」在表達對汪治國心切，卻面臨屬下的因循苟且而舉步維艱處境的充分理解以後，話鋒一轉：「第北方警訊日急，赤焰方張，豈能遽釋重負？」最後，更以「今三省剿匪，暴師原野，將士酷暑苦戰，正在極度緊張之時，如一抽身回京，則前功盡棄，思維至再，焦灼萬分，務請吾兄俯念艱危，立即返駕主持，以安人心而維大局」，[33]作爲結語。

29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頁 25。
30 胡適，〈汪精衛與張學良〉，《獨立評論》，號 13（1932 年 8 月），頁 3。
31 〈外患嚴重中之政潮〉，《大公報》，1932 年 8 月 8 日，第 2 版。
32 《申報》，1932 年 8 月 8 日，第 13 版。
33 「蔣中正電汪兆銘務懇俯念艱危立即返駕主持以安人心」（1932 年 8 月 7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下略），典藏號 002-080200-00053-117。

從此電報可知，蔣無意改變現狀，更無意離開他正在漢口主持的豫鄂皖三省剿共大業。他寧願抱持息事寧人的態度，並寄望周遭眾人也皆能體恤國事如麻的困境，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方式，期待政潮早日落幕。

蔣既然無意改變現狀，自無苛責張學良之意。故他於 8 月 9 日，特電張學良曰：「兄今日所處環境，與中客冬遭遇者無大殊〔異〕，實不勝同情之感。故之進退大節，誠有悉心考慮之必要。……此間討論所及，已假擬三策：一、不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二、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三、辭職而改組北平綏靖公署。……請兄權衡得失，取其最有裨於轉移大局，並穩佔個人立場者，擇一而行。要之，當此〔義〕勇軍得手之時，收復熱河，實爲最上之策。」[34]

常言道，「大夫無私交」，但從蔣致張的電文中，一開始就將此次政潮與去年冬天他被汪兆銘、胡漢民逼辭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之事相提並論，尤可見在他的思考模式中，他與汪、張的三角關係，不僅是公誼，也有私情，更有親疏之別。

若只從公務層面來看，蔣對張應帶兵入熱河的期盼之切，並不遜於汪。故對汪的訴求，本應心有戚戚。然而他卻沒有趁勢聲援，反而選擇在檯面上一味強調國難當頭，相忍謀國的必要性；在檯面下，則極盡安撫張氏之能事。對蔣而言，他的困境在於已將所有的嫡系部隊投入豫鄂皖三省的剿匪戰場，實無多餘兵力可資調派華北。維持現狀，自是最符合他的現實利益。故面對政潮，他除了要顧忌國府的顏面，亦得時刻不忘維護自身的權力基礎。尤其是當時盤踞華北的三大派系中，西北軍系與晉軍體系原本就是他的宿敵；他的權力基礎除了仰仗東北軍替他固守華北地盤外，也需代他看管其他兩個宿敵派系。這些顧忌，使他對此次政潮的處理，不能只考慮進軍熱河，更需擔憂其中所可能衍生的餘波。他的隱憂，可從反映他心境的日記中一覽無遺。例如 8 月 12 日之記述：「以今日消息觀察，汪事前與蔡與閻皆有接洽，以倒張爲制蔣之本，是誠搗亂分子之甚者也。」[35]

34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4），冊 16，頁 74-75。
35　〈蔣中正日記〉，1932 年 8 月 12 日。

易言之，他認爲汪在發動政潮之前，事先皆已與第 19 路軍總指揮蔡廷楷、原山西省省長閻錫山等原屬汪系的盟友間有所串聯。因而此次政潮的表面目的雖只是要張去職，然實際上的目的卻是要藉機削弱蔣家軍在華北地區的實質控制力，以便爲今後汪系勢力再起布局。

蔣介石對政潮的觀測已不侷限於熱河是否應即刻進軍，反而是汪系是否在重振旗鼓企圖再謀大位，於是他的布局重點自然在如何保張，尤其是奉系在華北的實質影響力不得因此次政潮而有所損傷。

8 月 11 日，他電張群曰：「漢卿名義，去留誠不必計較，但所部實力，斷不容他人侵損。倘有再進一步侵損、或蓄意虐待漢卿所部者，吾人萬不能遷就。此爲中確定之方針，亦即中與漢卿對汪最大容忍之限度。」[36]

從這封電報的用字遣詞，尤其是強調他與張學良的特殊情誼，依其表達方式，按邏輯推理，所欲傾訴的對象，似應是張學良本人，而非第三者。故這封名義上給張群的電報，實際上是希望藉由張群之手，轉交給張學良。而他之所以刻意要透過張群，主要是因張群現正擔負中央政府與華北地方當局溝通的任務。將電報直接發給張群，除等同於發給張學良外，還能發揮以下功能：首先，讓張群參與蔣、汪、張的三角關係運作，此舉不僅有助於張群瞭解三角關係中的親疏之別，更讓他得以擔任蔣、張同盟關係的見證人。復次，則希望他在擔任見證人以後，能利用此層親密關係，適時扮演好安撫張學良的角色，讓張學良於公於私，皆能理智面對。在保全蔣介石的顏面之下，也能適時降低對他的損傷程度。

若從事後的發展觀之，張學良雖沒如蔣介石所願，即刻帶兵進入熱河，但也願與張群配合，在裁銷北平綏靖公署改設軍事委員會上，皆能按照蔣氏所設計的方案進行。至於原本張氏沒有頭銜，而後經由將領抗爭之後，才被任命爲

36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16，頁 118。

代理分會委員長一職之事，因不違背蔣氏本意，[37]對蔣而言，並沒有將東北軍此舉視爲挑釁，故對雙方的結盟體制也不曾造成傷害。

汪兆銘方面，雖不肯復職，但也沒有堅辭，因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乃於 8 月 25 日決議，以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職務的方式，爲此次政潮所帶來的僵局，提供初步的解決方案。[38]

對蔣而言，面對此次政潮，他最大的顧慮，還是在於戒備汪兆銘趁勢串聯，壯大勢力。例如，他於 8 月 14 日政潮期間特針對時勢所記：「汪與銘樞聯合，擬以閩爲根據，幸未准委也。對張以維持其實力，而遷就其處置」。[39]

既然他將保全張學良的勢力視爲重中之重，對於張無意進軍熱河，他只能如日記中所云，只得「遷就」。當然，他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華北事務上有更多的主導權，是以他在 8 月 23 日得知剿共大業已有所進展時，特在日記上記述：「三省剿匪，期於九一八以前告一段落，能抽八萬部隊，以增援冀熱部隊則幾矣。」[40]

對於擱置熱河事務，專心剿共，而得不到國人諒解，此中情節他並非毫無所悉。例如 1932 年 8 月 29 日，他在日記上記與《申報》主筆陳景韓談話，陳認爲「對北方事，照此處理，現在專心剿匪與整軍，不發表意見，坐鎮武漢，以靜制動，沉機觀變，爲第一策。余以熱河問題不決，總非其事也」。[41]至於何謂沉機觀變，他於 8 月 31 日的日記中，又特別記載了與陳景韓的再次談話：「此時東北失地，外交緊急，而赤匪又猖獗，余苟不決心負擔，尚有何人，故余乃作革命初起時期之工作，先佔領長江幾個重鎮，穩定基礎之後，再向各處

37　例如 8 月 15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准張學良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汪兆銘留任行政院長，並通過軍事委員分會名單時，蔣介石還特地於當日致電張群，曰：「漢卿兄之名加入軍委分會當無問題，惟此時爲避免一時糾紛起見，故暫時從緩。」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2014），冊 3，頁 719。

38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頁 101。

39　〈蔣中正日記〉，1932 年 8 月 14 日。文中的銘樞，爲陳銘樞，張則是張學良。陳銘樞在九一八事變曾一度出任京滬衛戍司令，並與第 19 路軍系有淵源，爲粵系軍事大老，更是 1933 年 11 月發動閩變的要角。

40　〈蔣中正日記〉，1932 年 8 月 23 日。

41　〈蔣中正日記〉，1932 年 8 月 29 日。

赤匪進剿，最後則對付倭寇。是故目前對外交失敗，暫不表示意見，任人指責詆毀，在所不計，但臨時或有事變，不能不有所準備耳。」[42]

綜合上述日記，可知在軍事布局上，他之所以將剿共列為首務，主要在於他將剿共與保衛長江流域的華中地區視為一體之兩面。認為唯有徹底掌握華中，才能為安內攘外政策奠定成功的基礎。

至於關東軍方面，其為落實熱河作戰，則於 1933 年 1 月 2 日進攻山海關。而在確定關東軍將進犯熱河後，東北軍也終於在 1 月 17 日調派了四個師進入熱河，其防線在凌源、凌南一帶，大都偏於南部。這是靠近河北省而交通便捷的地區。至於東部的開魯、赤峰一帶，張除號召義勇軍增援熱河戰役外，亦請調中央軍及晉軍即日開赴熱東一帶，以增實力。[43]對於 33,000 名東北軍的進駐熱河，以及總計 135,000 名的部隊布防在熱河，[44]蔣介石顯然給予很高評價，認為除非日本從國內動員五個師來支援熱河戰事，否則按關東軍現有兵力，並無法突破熱河的部署。[45]

蔣介石的自信，來自他對熱河地理形勢的了解。例如他於 1 月 20 日的日記：「倭寇之弱點，就戰術上言，則熱河地形，非其所長也，故我方對於熱河，應速積糧秣以備固守。」[46]基於此一思維，他認為關東軍在遼河省境內的調度，雖勢在準備攻打凌源，但主要目的是：「彼猶想利用我對內部變動或漢奸，擾亂後方也。」[47]也就是說，他認為此刻熱河境外的大軍壓境，主要目的是威嚇，期盼藉此產生其他的政治漣漪效應，而非純為軍事布局。

42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16，頁 266。
43 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147。
44 當時入熱河的部隊，還有孫魁元（孫殿英）部隊改編成的第 41 軍約 20,000 人，馮占海的義勇軍改編成的第 63 軍約 15,000 人，以及其餘從東北三省轉進到熱河境內的各路義勇軍 35,000 人，而原本駐防的熱河湯玉麟的嫡系部隊也有 32,000 人。仲摩照久編，《熱河討伐及熱河事情》（東京：新光社，1933），頁 26。
45 〈蔣中正日記〉，1933 年 1 月 16 日。
46 〈蔣中正日記〉，1933 年 1 月 20 日。
47 〈蔣中正日記〉，1933 年 1 月 16 日。

鑑於東北軍已進駐熱河，而關東軍又有兵力不足問題；[48]故蔣深信，熱河危機已暫時解除，因而決定仍將重心放在剿共事宜，「然後可轉對倭寇」。[49]1月 31 日，他抵南昌，策定第四次圍剿計畫，強調原豫鄂皖三省剿共計畫已完成，今後則是利用已在江西、福建、廣東各省所設的要隘，實行封鎖，逐步縮小包圍。[50]

然令人遺憾的是，華北政局的複雜度，超過他想像，特別是華北的戰備體制，並不能如他所望的具體落實。例如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參議蕭振瀛於 1月 30 日，特致電蔣介石稱：

> 迭與宋〔哲元〕、商〔震〕、龐〔炳勳〕各將領詳談。各軍早已開到指定地點，攻守戰略始終未經指示。奉軍之在石河前線者，僅有三箇半旅，後方尚留步兵六旅、騎兵三旅、砲兵三旅。中央接濟及自籌，並由鐵路提出各款，不下四、五百萬；而發給宋、商、龐、孫（殿英）、高（桂滋）五部之開拔費，總共不到七萬元。兵站至今未設，子彈僅補充二三十粒。[51]

對於蕭的指控電文，最能呈現蔣的反應，莫過於 2 月 2 日他發給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的電文：

> 兄北行甚好。北寧路款，當催鐵部照撥。惟上月至今，前方各部僅共領漢卿臨時費七萬；閻〔錫山〕要開拔費，漢卿又來要求。中央前所發經費，不知其何用？軍心渙散可知。孟餘之言，或非過刻。甚為漢卿憂也。何時北行，盼覆。[52]

---

48 1932 年 3 月 9 日，滿洲國成立時，總計只擁有 107,400 名的武裝部隊，其中關東軍 22,400，新近收編的「偽軍」85,000 名。臼井勝美，《滿洲国と国際連盟》（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 70。

49 「蔣中正電陳誠決來贛對北竄之共軍務先與一大打擊後再轉對付日本」（1933 年 1 月 20 日），〈籌筆—統一時期（七十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10200-00075-025。

50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臺北：國史館，2014），冊 4，頁 18。

51 「蕭振瀛自電蔣中正前線各軍已就指定地點惟攻守戰略未明且給養不足難迎戰日軍及現正與蔣伯誠與各將領共商補救辦法及蔣中正回電已告張學良切實辦理」（1933 年 1 月 30 日），〈侵擾熱河（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200-00010-309。

52 「蔣中正電何時北行已催鐵道部照撥北寧路款」（1933 年 2 月 2 日），〈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至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70100-00030-011。

文中所謂孟餘之言，即指時任鐵道部長顧孟餘於 1932 年 6 月，曾陪同行政院長汪兆銘到北平考察政務，期間也曾會晤張學良，認爲奉系在華北的所作所爲「足以亡國」，是其回南京後對奉系的總評價。[53]

蔣在電文中重提此事，除了對張學良辦事不力的不滿外，也反映他對熱河戰事前景堪憂的心境。這些新愁舊事，自然也會影響他的判斷與決策。例如，他於 2 月 12 日，聞倭寇宣言以 8 師兵力攻熱河，特在日記上記下：「其或爲擾亂漸進之法，則未可知也。總之，倭寇攻熱，當在本月之內，於此半年內華北局勢嚴重，預備其失守。反動者必藉此以攻擊中正，必至體無完膚，故當備此誣辱，卓立不動，以貫徹余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張，先鞏固革命基礎，整頓革命陣容，再與倭寇決戰也。」[54]

從這篇日記的敘述，可知蔣早於 2 月 12 日就對熱河失守有心理準備，並開始考慮失守後的善後布局。

（二）日軍的閃電夾擊

「馬匹運輸」以及「閃電夾擊」是關東軍布署熱河作戰的兩大策略。熱河多山，除河流穿插其間所形成的綠洲外，皆是沙漠地帶，尤其是西北地區酷寒，一向少有人煙。人口集中於較靠長城各關口的南部平原地帶。[55]境內缺鐵路，也少公路，故部隊的運輸，靠冬季的結冰期，結冰後的河流除便於通行外，平地上的厚實冰層也利於行走。由於這些地理特色，故關東軍於 1933 年 2 月 15 日所擬定的作戰計畫，首要重點在如何於錦州、北票、朝陽、凌源、平泉道之間設立兵站，以及善用馬匹作爲運輸工具。復次，則是將作戰的樞紐定位在如何早日攻佔赤峰與承德。南北挾擊以及三路出兵是針對此一戰略目標所設計的

53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頁 130。
54 〈蔣中正日記〉，1933 年 2 月 12 日。
55 仲摩照久編，《熱河討伐及熱河事情》，頁 74-80。

作戰方案。軍事行動開始的第十天就要攻佔赤峰，以及第五天就要攻佔承德的外圍據點凌源，是閃電夾擊戰的主軸。[56]

赤峰位居熱河的中心地帶，原本就是聯絡南北交通的樞紐；承德是熱河省會，故循作戰方案中所設計的兵站，從北票一路攻佔到平泉道；爾後若再拿下承德，就代表已將熱河境內的所有菁華城市一舉囊括。

關東軍以朝陽爲界，將熱河劃分成兩大戰區：以北屬於第 6 師團及騎兵第 4 旅團的作戰區域；以南則是第 8 師團暨混成第 14 旅團。南北戰場配置的兵力不一，北邊是 7,500 人，2,200 匹馬；南邊是 11,000 人，2,100 匹馬。[57]除此之外，南北戰場也搭配傀儡部隊，北邊約 36,500 人，南邊爲 26,000 人。[58]

不過，所有的傀儡部隊並不擔負作戰任務，攻城略地的軍事行動全由日軍負責，傀儡部隊只擔負戰地的治安以及追擊殘兵，而且只限於北熱河戰場。南熱河戰場的傀儡部隊集中在遼寧省境內，並未派遣到熱河，他們的編制純粹是爲了緊接熱河戰役以後的長城戰預作準備。[59]

至於日軍參戰部隊的動員令，早在 1 月 28 日就下達；司令部的整體作戰計畫，是在 2 月 9 日定案。[60]具體的兵站設置及補給作業的協調會是在 2 月 15 日展開。[61]內閣 2 月 17 日通過後，2 月 18 日正式發布作戰命令。[62]

將此次的軍事行動限定於熱河境內，是作戰命令中的主要規定事項。理由是熱河爲滿洲國的既定領土，在熱河境內用兵，可視爲是執行國家主權行爲，

56　中野良次，〈回想「滿洲事変の眞相」抜萃〉，收入《現代史資料（11）：続・滿洲事変》，頁 797-805。

57　中野良次，〈回想「滿洲事変の眞相」抜萃〉，收入《現代史資料（11）：続・滿洲事変》，頁 802。

58　配置在北熱河戰場的有張海鵬的 23,000 人，劉桂棠的 10,000 人，李守信的 3,500 人。配置在南熱河戰場的有程國瑞的 20,000 人，李際春的 6,000 人。佐々木到一，〈討熱作戦の回顧〉，收入《現代史資料（11）：続・滿洲事変》，頁 793-796。

59　佐々木到一，〈討熱作戦の回顧〉，收入《現代史資料（11）：続・滿洲事変》，頁 793-796。

60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 3・日中戦争（上）》，頁 10。

61　中野良次，〈回想「滿洲事変の眞相」抜萃〉，收入《現代史資料（11）：続・滿洲事変》，頁 797-798。

62　內田尚孝，《華北事変の研究：塘沽停戦協定と華北危機下の日中関係 1932-1935》（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 49。

不涉及國際事務。但若戰事超越長城，進入河北境內，不僅會引起中、日兩國之間的戰事，也會影響國際視聽。故嚴令所有部隊不可越境。易言之，按其邏輯，在熱河境內的所有武裝部隊，只要非效忠日軍者，皆可視爲侵犯滿洲國主權的叛亂集團。因而討伐這些部隊，不能視爲日、中兩國之間的戰爭行爲。[63]

爲了圓此一論述，2 月 22 日，滿洲國還煞有介事對國府發出通牒，要求熱河省內駐軍於 24 小時內撤退；翌日，日本政府更向外交部提出節略，謂進攻熱河係根據「日滿議定書」。[64]

就在日本政府向國府表達有權向熱河進軍當日，亦即是 2 月 23 日，關東軍向熱河發動總進攻。只是令人意外的是，熱河戰事，並不如湯玉麟於開戰前所宣示的「捨奮鬥無以求生，捨犧牲無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65]般的奮勇抗敵，反而是駐守第一線的熱河駐軍崔興武及董福亭兩旅早已祕密與日軍達成協議。因而，在日軍發動攻擊的翌日，駐守熱河北境重鎮開魯的騎兵第 9 旅崔興武部即不戰而退，而駐守南境朝陽的 107 旅董福亭部，則是部隊譁變，整個部隊在堅守陣地一天後，就開城迎敵。[66]

易言之，開戰不及二日，北境的開魯及南境的朝陽就相繼陷落；至於錦州到朝陽鐵路線上的北票，早在關東軍發動總攻擊前的前兩日，就已爲日軍第 6 師團控制。[67]按關東軍的原本作戰計畫，準備三路出發，路線如圖 1 所示，北部戰場是 2 月 23 日開打，分向北票及開魯進攻，預定十日後兩支部隊可在赤峰會師；南部戰場是 2 月 27 日開始啓動，由綏中直攻凌南，預定五天後可打到凌源。[68]

63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 3・日中戦争（上）》，頁 9-11。

64 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3，頁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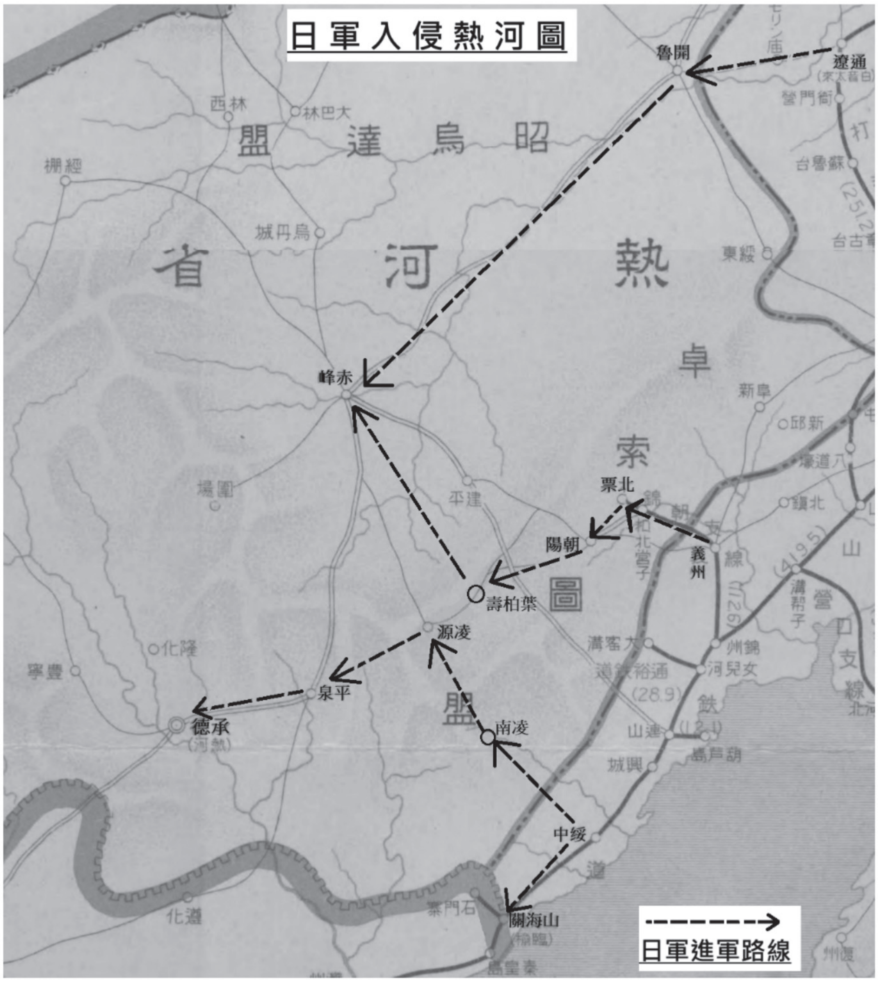
65 〈二十七將發抗日通電〉，《申報》，1933 年 2 月 20 日，第 3 版。

66 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臺北：中央日報，1976），冊 9，頁 59-60。

67 仲摩照久編，《熱河討伐及熱河事情》，頁 44。

68 中野良次，〈兵站司令部竝関係関機会同時に於ける軍後方主任参謀の説明事項〉（1933 年 2 月 15 日），收入《現代史資料（11）：続・滿洲事変》，頁 798-805。

圖 1　日軍入侵熱河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鐵道省運輸局編，《滿洲國鐵道圖》（東京：鐵道省運輸局，1933）。

不料戰事一開打，三路部隊皆似入無人之境，北部戰場不及 7 日，日軍第 6 師團及騎兵第 4 旅團就於 3 月 2 日在赤峰會師；南部戰場則更不到 3 日，亦即是 3 月 2 日就已攻陷凌源。就在承德門戶大開之際，戰前倡言「捨奮鬥無以

求生」的湯玉麟卻佯稱赴前線督戰，暗地徵集車輛，滿載鴉片，竟於 3 月 4 日放棄承德潛逃。日軍僅以 128 名騎兵輕取承德。[69]

（三）熱河戰役失利的原因

「熱河保衛戰」事前曾高唱雲霄，是眾人矚目下的戰鬥，和九一八事出突然的軍事奇襲不可同日而語。殊料不到十日，承德不戰而棄。各方皆痛責當局未盡責任，史學者蔣廷黻就認為，熱河淪陷，「精神上的損失遠過於東北三省不抵抗而失敗」。[70]

立法院長孫科也發言指出：「戰之勝敗，為兵家常事，然不戰而退，實為莫大恥辱。至此次戰事之責任問題，凡在前線指揮之湯玉麟等各軍事長官，直接負責，自應嚴予懲處，而張學良身為華北軍事最高長官，當然負最大責任。」[71]蔣介石亦在日記中坦言：「觀倭寇攻熱之配備，形同兒戲，前敵如稍有布置，直可使其殲滅無遺。今竟致喪師失地，誠不能為天下後世所諒也。」[72]

不過，若從張學良的角度，也有難言之苦。例如張學良於 3 月 1 日電告蔣介石：「此次朝陽、開魯兩處失守，並非完全由於敵軍之猛攻，實係具有下述原因：（1）朝陽一役係熱軍中譁變一部，當地人民起而內應。（2）開魯一役，亦係戰事後，城內人民乘機反動，崔旅不得已退出城外。」[73]此外，張在 3 月 2 日晚間接待胡適晚餐時，告訴胡氏說凌南已失了。他說，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此次他派丁旅進入熱河境內，即有二營長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74]然東北軍之不得人心，非僅湯玉麟之第五軍團為然，東北其他各軍的表現，也殊令人失望。凌源一帶的萬福麟東

---

69 金以林，〈論長城抗戰〉，《團結》，2005 年第 4 期，頁 16。

70 蔣廷黻，〈熱河失守以後〉，《獨立評論》，號 43（1932 年 3 月 26 日），頁 4。

71 〈孫科主張張學良速辭職謝國人〉，《申報》，1933 年 3 月 6 日，第 9 版。

72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5），冊 19，頁 39-40。

73 「張學良電蔣中正朝陽開魯失守因熱河軍隊譁變及人民內應擬赴消弭隱患」（1933 年 3 月 1 日），〈革命文獻—長城戰役〉，《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200-00016-081。

74 丁旅是指第 108 師，師長為丁喜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省教育出版社，2001），冊 6，「1933 年 3 月 2 日」，頁 199。

北軍也不戰而走。曾往協調的軍事委員會委員李烈鈞向蔣形容，「東北軍見日〔軍〕即跑，一潰數百里；朱梓橋有勇無〔謀〕；張輔臣遲遲不行；漢卿更難言也」。[75]

電文中的朱梓橋，原名爲朱慶瀾，早年曾任黑龍江省將軍，九一八事變後他在上海籌組東北軍後援會，爲人清廉，深得人心。上海華僑辦事處向南洋華僑募捐之所得，均全數交由他支配。他也因而被各方擁戴，出任遼、吉、黑三省聯軍總司令，負責鎮守熱河與東三省接壤的第一線；爲數約十餘萬的義勇軍，歸他管轄。[76]

按日文的資料，駐守開魯外圍的劉桂棠，於戰事開展三天前，即 2 月 20 日率 2 萬餘人向關東軍的投誠，是導致駐守北境的熱河防線不戰而潰的首要因素。[77]因其陣前易幟所帶動的投降潮，使 2 月 23 日發動總攻擊的關東軍一開戰就似入無人之境；開魯就是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爲日軍所陷。

究其實質，朱慶瀾所統率的義勇軍並不是由其一手訓練組織而成。這些沒有經過軍事訓練，武器裝備不足，臨時湊合的民眾武裝團隊，本無防禦陣地的軍事實力，所長僅是在自己地盤專事擾亂破壞的游擊工作。然因朱慶瀾好大喜功，爲顯示力量，以補給爲誘餌，將這些抗日勢力都號召來熱河，無異爲敵人肅清後方。尤其是這些成分複雜的武裝部隊，原本不少就是綠林出身者，[78]當初他們各自投入義勇軍的動機不一；再者離開根據地，轉戰到民貧財困的熱河省後，更因補給的不足，時有內鬨。[79]內部既不團結，外部利誘自然難擋，劉桂棠就在關東軍許諾他日後出任熱河省邊防司令的誘惑下，決定陣前倒戈。[80]

---

75 「李烈鈞電蔣中正東北軍潰華北形勢可慮擬赴太原促先救熱河」（1933 年 2 月 28 日），〈侵擾熱河（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200-00013-395。

76 黃恆浩，〈東北義勇軍四年〉，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臺北：國史館，1981），頁 716。

77 仲摩照久編，《熱河討伐及熱河事情》，頁 44。

78 黃恆浩，〈東北義勇軍四年〉，收入《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 686-717。

79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頁 117-118。

80 黃恆浩，〈東北義勇軍四年〉，收入《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 705。

至於電文中所提的張輔軍，本名張作相，原任吉林省省主席，嗣後被任命爲第二集團總司令兼第六軍團總指揮，負責整個熱河戰役及義勇軍的直接調度。然而這位熱河戰役的最高指揮官，遲至 3 月 1 日，[81]也就是開魯前線的義勇軍已全面潰敗，朝陽前線則因熱河軍系第 107 旅的臨陣脫逃，赤峰已面臨南北合圍的困窘時刻，才姍姍赴承德。

電文中所提的另一關鍵人物，亦即是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的張學良，負責駐守華北，亦負責支援熱河戰事。他麾下的第四軍團總指揮萬福麟於 3 月 1 日，在日軍開始逼近凌源時，決定棄守陣地，將所轄的四個師全數撤回關內。[82]此一舉動，不僅讓攻打熱河南部戰場的日軍得於 3 月 2 日順利攻佔凌源，更因原本部署在冷口、界嶺口的東北軍第 106 師及第 101 師隨即轉退關內，讓主攻南部戰場的日軍混成第 14 旅在未經激烈戰鬥的情況下，順利於 3 月 10 日進佔鐵門關、喜峰口、董家口等長城要隘，[83]爲日後的長城保衛戰預伏先機。

對照北平軍分會的戰前部署以及戰事發生後的實際運作，可知事前的部署，皆淪爲紙上作業，並沒有徹底落實。計畫與運作之間存有巨大差距，對身居領導中樞的國府要員們而言，並不意外。例如負責支援熱河戰事的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在承德淪陷後的第二天，亦即是 3 月 6 日，特別針對 2 月中旬他到北平及承德考察戰前部署的實際體驗而發表承德淪陷感言。他自承，在他回南京後已向各軍事長官彙報，熱河戰役頂多只能支撐一個星期至十日。主要原因在於部隊的戰術老舊以及沒有奮死一戰的熱枕。[84]

易言之，熱河戰役必敗，國府要員們早已心知肚明，這亦是前方戰線，尤其是非東北嫡系的華北將領宋哲元、劉汝明、商震、龐炳勳等於戰前紛紛向國府派駐北平軍分會參議蔣伯誠請願，表示「此次對日作戰，非鈞座北來，前途

81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頁 133。
82 蔣永敬，《抗戰史論》，頁 148。
83 仲摩照久編，《熱河討伐及熱河事情》，頁 19。
84 〈熱戰結果在預料中？宋代院長昨在滬發表談話〉，《大公報》，1933 年 3 月 6 日，第 3 版。

不堪設想。言時聲淚俱下，意極懇切」。[85]認為非蔣介石北上，不足以挽救熱河戰局，是當時身處華北戰場非東北嫡系將領的共同心聲。惟對於同樣身處華北戰場的中央嫡系要員們來說，熱河戰局已是必敗之勢，誰來都無法挽救，因而勸蔣介石不可北上，反而是他們的論述重點；並認為早日布局善後，才是當務之急。

此一論述，不僅可見於戰事剛開始的不利時期，[86]也同樣出現在全面戰局面臨潰敗之際。[87]這些代表中央政府視野所提出的觀察心得，自然皆是掌握當時華北政情的最重要資訊，亦為理解蔣介石的熱河戰後布局提供最佳線索。按蔣介石早先的判斷，認為關東軍兵力不足，除非得到日本國內部隊的增援，僅憑關東軍不可能輕易發動熱河戰事。因而他把重心放在催促東北軍早入熱河，認為只要熱河防禦部署得當，就可逼使關東軍打消戰意。然不料關東軍僅從駐滿洲國境內的五個師中，抽調兩個師、一個騎兵旅團，以及臨時整編而成的一個混成旅團，在總兵力只有 18,500 人的情況下，就敢貿然啓動戰事。

對於自己的誤判，借用他日後向胡適的解釋，是「不料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清楚的多多」。[88]既然原本所有的希望，皆寄託在關

85　〈蔣伯誠參議自北平轉陳宋哲元等將領均望蔣公北來領導對日作戰呈蔣委員長電〉（1933 年 1 月 24 日），收入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 585。

86　此為人在北平負責支援華北軍事的張厲生致蔣介石的電文：「熱河軍事指揮既不統一，後方尤缺乏強有力之策動。公私方面均認為毫無把握。此間言論皆渴望鈞座北上，以挽頹勢。惟職以為：鈞座不北上則已，一經北上，則非一手包辦、痛予革除不可。否則徐觀軍事變化，隨機應付，鈞座仍可暫緩成行。」參見：「陳立夫電蔣中正據張厲生電告華北情形並擬親往報告及請示」（1933 年 3 月 1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070-084。

87　此為軍政部次長陳儀致蔣介石的電文：「（1）鈞座負全國之重，動關國際視聽，宜居中調度，命將出征，不宜身臨前敵，不留餘地。蓋與往年討叛情形，固不同也；（2）熱河倭寇志在必得，陷落勢所難免。倭聞鈞座親征，必攻擊益力。彼時適或不守，必至進退維谷；（3）此次中倭之爭，舉世皆知我武力不如倭。所以不顧犧牲，徒手猶戰者，為維護正義公理耳。故戰之形式，非屬進攻，而屬抵抗，敗亦不足為恥。惟一切舉動，宜忍耐持重，步驟不可錯亂。」參見：「陳儀電蔣中正基於鈞座負全國重任熱河軍事變化難測恐不利安全及我對日抵抗目的等因請終止北上另以派何應欽等視察戰地」（1933 年 3 月 2 日），〈侵擾熱河（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200-00010-162。

88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冊 6，「1933 年 3 月 13 日」，頁 207。

東軍不敢貿然發動戰事，期待既破滅，在喪失先機的情況下，如何善後便成爲蔣介石的唯一選擇。

三、長城保衛戰的三部曲

在熱河北部戰場已全面瓦解，南部戰場還沒展開的前夕，蔣介石已開始規劃他北上的時機。2 月 26 日，他在日記上曰：「余北上時期，第一爲支持現在戰局，第二爲收拾敗後殘局，第三爲統率華北新起之戰局。此後對日作戰，惟有以運用外交爲重心，使倭寇時受精神上之打擊爲第一要義」。[89]

此刻的日記，若再與他十四天前的日記，亦即是前面所述決定棄守熱河 2 月 12 日的心境對照，就可知他所謂的三個時機選項，第一項只是開場語，他自知可能性不大，第二、第三選項才是他的考慮重點。此外，他強調今後對日作戰，將以外交爲重心，也間接透露，他北上的目的是善後，而非軍事決戰。軍事只是爲了達到他外交上目的的輔助手段。

既然在他所設計北上的目的中，原本已無決戰的選項，則他的所謂善後，又應如何解讀？在熱河開戰前夕，長期擔任他與日本朝野要人溝通管道的前外交部長黃郛，就於 2 月 20 日傳達日本參謀本部的主要訴求。他在致蔣介石電文中稱：

> 昨擇〔李擇一〕君由日偕岡田〔有明〕來謂：與松〔井石根〕翁在鎌倉密晤。松謂：中日情勢近益惡化，東亞前途致堪憂慮。蔣如能下決心，用最速手段將張免職，我當在軍部方面，負責斡旋，或能挽回險惡局勢。如不能照辦，則日方在華北軍事之進展，恐事勢推移，未必即到長城而止。是時噬臍難及。
>
> 擇答：此題過為重大，華北正當劍拔弩張之際，臨陣易將，恐難辦到。松謂：臨陣如難易將，預測熱河相持之勢，張敗乃時間問題。俟

89 〈蔣中正日記〉，1933 年 2 月 26 日。

> 其敗時，即予免職，重以斡旋，則軍事或能限於熱河區域。並謂：此事只能轉告膺〔白，黃郛〕、岳〔軍，張群〕二人轉達；否則萬一漏洩，恐減少斡旋力量云云。[90]

電文中的松井石根中將，時升任日本日內瓦裁軍會議全權代表。由於他曾任參謀部第二部長，此刻又從參謀本部借調出任新職，故他的意見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於九一八事變以後，關東軍已取得籌建滿洲國事務的所有權限，因而對於熱河戰役的戰略部署，不須事事請示參謀本部。故惟有撤換張學良，才能讓熱河戰事早日止血的意見，雖不能等同視爲關東軍的意見，不過，東京總部既無意擴大戰事，也就代表日本國內不會增援熱河戰事，關東軍在兵力有限的情況下，當然也無力擴大戰爭。

（一）國軍的反攻

既然東京的陸軍總部已表達無意擴大戰事，並開出要撤換張學良的條件。3 月 8 日北上石家莊的蔣介石的首要工作，莫過於以輿論難平、大局爲重，勸張學良辭職，以及重新改組華北的軍政管理機構。3 月 11 日張學良通電辭職，3 月 12 日國府明令准張氏辭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及北平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職，派何應欽爲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91]此後，國府得以直接掌控華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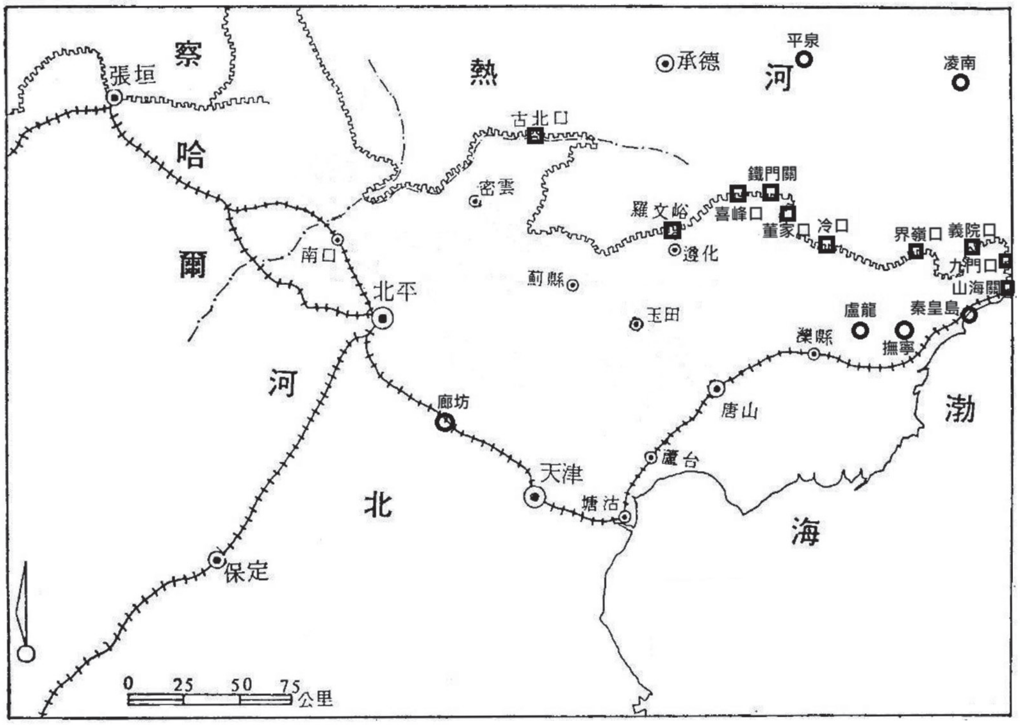
此刻蔣介石面臨的挑戰，已不是如何挽救熱河，而是如何確保平、津兩地的安全。長城自古以來，就是防禦北方邊族進犯中原的軍事工程，因華北本是平原地帶，一過長城，關內已無險可守。然匪夷所思的是第四集團軍從熱河撤離時，並沒有顧及長城防線，因而除了在古北口的外圍，日軍第 8 師團曾在青石樑遭遇奉軍第 107 師的伏擊外，其餘關口皆沒有遭遇抵抗，至 3 月 12 日就逐一被日軍佔領。

90 「某人電蔣中正轉張羣綜合日本要求我將張學良免職以周旋日本軍部在華北軍事進展等消息應係爲緩兵之計實則戰意已決」（1933 年 2 月 20 日），〈侵擾熱河（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200-00010-153。

91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3，頁 240。

易言之，3 月 4 日至 12 日之間，從北至南的長城線中，已有古北口、鐵門關、喜峰口、董家口被日軍佔領。其中，冷口曾於 3 月 4 日一度被日軍佔領，然因該關口不如其他地方險峻，日軍在兵力有限情況下，主動放棄該地，而轉進到喜峰口。因而，如圖 2 所示，在長城線的主要 11 個關口中，日軍加上原已佔領的山海關、九門口，總計已佔領了 6 個，僅義院口、界嶺口、冷口、潘家口及羅文峪 5 個關口仍在國軍手中。

圖 2　長城邊上的各主要隘口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針對日軍所佔領的長城關口要隘，國軍的第一波反擊，主要集中於 3 月 11 日的夜襲喜峰口，擔綱的是第 29 軍。此舉被天津《益世報》比喻為中國版「凡爾登」戰役，[92]是國軍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北方戰場得到的首次勝利。不過，對於此次戰役，中日兩國卻有相當不同的敘述。

按北平軍分會所發表的戰鬥報告，循灤河右岸，向蔡家峪、白台子一帶夜襲的第 109 旅第 217 團王長海所報之戰果：毀敵砲 18 門，死敵砲兵司令官一員，獲敵詳細作戰地圖及滿洲圖數份，機關槍二十餘架，死傷官兵五、六百餘。我營長蘇東元等軍官十餘員殉國，營長王子亮等三十餘員軍官受傷，士兵傷亡六百餘名。

復次，循灤河左岸，襲擊北山、三家子的第 38 師第 224 團董升堂部所呈上的報告則為：「第一營行抵北山土即遇敵之騎兵一連，我軍乘其熟睡之際，即用大刀盡行砍斃，計騎兵百餘名無幸免者。」隨後，第一、第二、第三營分別向橫城子、北丈子、三家子之敵包圍襲擊，「我官兵乘敵睡眠之後，即用大刀猛砍，當時敵死於我大刀者達千餘名之多，並毀敵之接濟車、彈藥車十餘輛」。[93]

這份戰鬥報告，藉由媒體的轉述，開始有極其誇張的報導出現。例如，1933 年 3 月 14 日《中央日報》的報導，則已變成：喜峰口大捷，「斃敵六千餘，奪獲大炮十八尊，唐克車七輛，步槍五千餘枝」。[94]也因此一新聞報導，緊接而來的《攝影畫報》、《東方雜誌》、《申報月刊》等雜誌亦先後刊出被繳獲的坦克。[95]

僅憑大刀就能擄獲坦克，也讓《大公報》報導「大刀待用急盼各界捐助」，負傷軍官表示：「我們所缺少的武器是大刀」，「最好是送給我們大刀，我有二十把大刀，再赴前線，就可比從前增加十分力量」。[96]

---

92 〈喜峰口的英雄〉，《益世報》，轉載自《國聞週報》，卷 10 期 12（1933 年 3 月 27 日），頁 7。
93 北平軍分會編，《長城各口之戰鬥》（北平：北平軍分會，1933），頁 28-29。
94 《中央日報》，1933 年 3 月 14 日，第 2 版。
95 侯杰、徐開陽，〈長城抗戰與二十九軍大刀神威再審視〉，《河北學刊》，2020 年第 4 期，頁 67。
96 《大公報》，1933 年 3 月 31 日，第 4 版。

相較於中方大獲全勝之記載，日軍方面則可彙整出以下的紀錄：戰役始自 1933 年 3 月 12 日凌晨 2 時 15 分至上午 8 時，此夜月明，可視度良好，作戰地點位於喜峰口第一關門以西 1 公里至潘家口東 3.5 公里處，長城線北方 1.2 公里的河灘平坦地域。戰場東西寬約 3.5 公里，南北長約 2 公里。日軍參戰人數 353 名，重機槍 5 挺，炮 7 門。損失合計爲：戰死 14 名，戰傷 46 名，馬戰死 22 匹，戰傷 10 匹。中國參與夜襲部隊約有 2,000 名，現場擄獲 441 枝各種槍枝以及 380 口大刀。此外，現場也有 730 具遺屍。若再進一步檢驗整個戰場的戰鬥情況，可發現駐守三家子日軍步兵第 27 聯隊步兵炮小隊的〈陣中日誌〉中，有兩枝步槍損壞，一枝刺刀折損的紀錄，代表此地曾發生過小規模的肉搏戰。此外，駐守在營房村戰場的乘馬討伐隊中，因砲彈致死者有兩名，格鬥中死於大刀砍殺者一名。[97]

憑大刀就可擄獲坦克，此等荒誕之事，本屬難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傳聞，卻被新聞媒體當作戰績宣揚，所反映出的民心，就是中國需要鬥士，需要僅憑血肉之軀也勇於抗日的英雄。

第 29 軍所締造的喜峰口神話，雖然不能幫助國軍奪回已失去的長城各關口，但其所帶動的國軍奮戰意志，確已逼使關東軍改變作戰策略。按關東軍原先的規劃，滿洲國的國境線是以長城各關口爲界，故攻打長城各關口，本是熱河戰役的一環。故關東軍是以原有的 18,500 兵力轉佔長城各關口。

以 1,500 人對抗第 29 軍的 17,000 人是喜峰口戰役時雙方動用的兵力。[98]第 29 軍從未奪回喜峰口，尤其所謂大刀砍人驚人戰果，更純屬宣傳。按日方紀錄，當晚夜襲，總計有 60 人傷亡，被大刀砍死者只有一人。易言之，對日方而言，喜峰口戰役雷聲大雨點小，還不構成威脅；緊接的古北口、羅文峪及冷口戰役，戰果不佳，才讓日軍頭痛。

97 姜克實，《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頁 190-234。
98 姜克實，《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頁 513。

日軍進入長城線，與國軍的第一次交手，如前面所述的是在古北口北方的青石樑，時為 3 月 7 日，對手為東北軍系的第 67 軍第 107 師張政枋部。[99]張部是在熱河戰役中，其餘東北系的友軍皆「見日軍即跑」的情況下，第一支奮勇抗敵的部隊。

第 107 師的積極應戰，使日軍被迫拖滯了兩天，到 9 日才順利排除威脅，連夜向古北口急行。[100]10 日起，日軍首先攻擊古北口東方約五公里處的將軍樓，守軍為 53 軍的第 112 師，該軍在師長張延樞率領下奮戰至 11 日的午前 10 時，傷亡殆盡，終於被逼撤守。由於該陣地被突破，也使得剛從徐州一帶調來支援戰事的中央軍第 25 關麟徵部，在側背受敵的情況下，不得不於 12 日撤離古北口，轉進到古北口南邊的南天門設防。[101]

在拿下古北口後，日軍新增援的混成第 33 旅團已從關外搶進關內，並於 3 月 16 日攻佔界嶺口。至此，日軍認為初期長城攻佔計畫已達成，而從 2 月 23 日正式啓動戰事到攻佔界嶺口，日軍總計傷亡 389 人，其中 118 人戰死，271 人受傷。[102]

對一支 18,500 的部隊而言，2%左右的傷亡率，自然不會影響戰力。但問題是在長城線上所遇到的國軍，不僅會主動出擊，而且敗而不退。這些是九一八事變以後，在北方戰場前所未聞之事。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界嶺口之戰，原本在熱河戰役，不待前方接戰，就聞風而逃的第 116 師，此刻經由繆徵流師長在界嶺口布防，雖仍未能守住隘口，但敗而不退，並在青山口另設陣地，與日軍相持。[103]

從喜峰口到古北口，國軍敗而不退的奮戰精神，亦讓日軍警覺長城戰役不可與熱河戰役同日而語。故 3 月中旬後，關東軍需要緊急調混成第 33 旅趕到

99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 3．日中戦争（上）》，頁 13-14。
100 姜克實，《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頁 354。
10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灤東及長城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頁 5-6。
102 仲摩照久編，《熱河討伐及熱河事情》，頁 58。
10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灤東及長城作戰》，頁 7。

關內支援戰事。依戰前的日本陸軍編制，旅團的標準配備是 3,997 人。[104]但因混成第 33 旅是臨時整編，按例不可能達到標準足額。不過，總而言之，征戰長城日軍的總兵數，因這支增援部隊的參與，使其總兵力人數達到 22,000 人左右。

待這支增援部隊到達後，日軍為一舉拿下其餘尚未到手的義院口、羅文峪及冷口三大關口，於 3 月 17 日展開對義院口、羅文峪攻擊。義院口於 3 月 18 日順利攻陷，[105]然在羅文峪卻意外失利。該關位於喜峰口西南側，是關內遵化道通往承德的必經要道，時由第 29 軍暫編第 2 師劉汝明駐守，兵力約 10,000 人；而擔任主攻的是日本第 8 師團早川支隊，兵力約 1,491 人。激戰 4 日後仍無法攻破，最終只得放棄，並於 21 日循原路撤回承德。[106]

羅文峪是長城戰役開打以來，國軍首度成功守住陣地的勝利，也為緊接而來的冷口攻防戰揭起成功應戰的序幕。此刻駐守冷口的是晉軍軍系第 32 軍第 139 師；日方負責主攻的迎支隊是由第 6 師團及第 8 師團中抽調出五個步兵中隊、一野砲兵中隊及一工程隊臨時整編而成的部隊。原來是預定派赴喜峰口，但因喜峰口戰役轉危為安，故轉派到冷口。不料，日軍 3 月 23 日開始啓動的總攻擊，卻遭遇第 139 師黃光華部的頑強抵抗。纏鬥兩日後，日軍第 8 師團不得不下令暫停攻擊，將部隊撤至冷口北方 13 里處的蕭家營子。[107]冷口也繼羅文峪後，成為成功保住陣地的第二個長城要塞。

（二）日軍的灤東作戰

不能全面掌握長城的關口，自然代表滿洲國的國防邊界線還未成功建立。尤其是日軍表面上雖已經控制了 8 個關口，[108]但界嶺口、喜峰口以及古北口等關口上，國軍未全面撤守，仍在附近制高點上部署陣地，與日軍對峙。日軍的

---

104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頁 255。
105 仲摩照久編，《熱河討伐及熱河事情》，頁 57。
106 姜克實，《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頁 478，513。
107 《太平洋戰争への道：開戰外交史 3．日中戰争（上）》，頁 15。
108 分別為山海關、九門口、義院口、界嶺口、董字口、鐵門關、青峰口、古北口。

困境在於兵力單薄，在長達 400 公里戰線的長城攻防中，總體能投入的部隊只有 2 萬 2 千餘人，面對的國軍總數則高達 25 萬人。[109]再者，長城各關口山巒重疊，群峰聳立，這些地形限制，亦讓日軍無法及時補給彈藥，影響戰力。

爲打破僵局，關東軍於 3 月 21 日及 25 日，在相繼放棄攻打羅文峪及冷口之後，將主力部隊調回熱河境內休養整編，並開始調整作戰方向，變更由熱河一舉突破長城的正面作戰計畫。關東軍改弦更張後的新作戰目標，改由業已佔據的山海關方向切入，以求席捲灤河以東，拊長城之背。[110]

此次作戰目的，在於要越過長城東境，進入灤河流域，亦即是建昌營以南，灤河以東的區域。戰事於 3 月 26 日重新啓動，初期目標是位於山海關以北的石門寨，在日軍第 6 師團出動飛機及坦克的助攻之下，於 4 月 1 日順利攻破第 57 軍 115 師姚東藩部的防線。4 日，更揮軍攻下屏障秦皇島背面之要地海陽鎮；16 日再陷北戴河，守軍第 57 軍何柱同部退守灤西。[111]

在東路突破長城線後，日軍接著於 9 日將主力投入冷口，經三晝夜鏖戰後，第 32 軍 139 師黃光華部於 11 日被迫棄守，並將殘部撤至灤河南岸。冷口的失守，亦影響原在界嶺口附近與日軍對峙的青山口陣地，第 116 師繆徵流部在左右側的長城防務皆被攻破的情況下，亦於 12 日棄守。[112]日軍在冷口得手後，隨即分兵南下，一路於 15 日進攻遷安，另一路則於 16 日相繼攻下盧龍、昌黎。[113]遷安位於灤河上游，佔遷安則威脅灤河守軍側背，對仍在喜峰口周邊設防的第 29 軍宋哲元部形成前後夾擊的態勢，迫使第 29 軍不得不轉移陣地，並隨即撤守通州以東沿運河布防。[114]自此灤河以東所有區域，於 4 月 16 日全面淪陷。

---

109 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委員會編，《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上冊，頁 282。
110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 4，頁 69。
111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3，頁 245-246、251。
112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頁 118-119。
113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3，頁 250-251。
114 黃道炫、王希亮，《局部抗戰》，收入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卷 1，頁 181-188。

從軍事角度而言，佔灤東將對山海關至喜峰口間所有關口的敵軍造成腹背受敵之威脅。因而灤東戰役的成功，不僅使關東軍得以掌握上述關口，亦讓滿洲國國防線的建構達到階段性任務。

然令人意外的是，這些進駐灤河以東的部隊突然於 4 月 20 日相繼撤離。理由是天皇反對進軍華北。日軍在參謀本部的嚴令之下，一一返回東北。

隨著日軍不戰而退，匆忙後撤，中國軍隊立即跟蹤收復失土。眼見灤河以東的遷安、盧龍、昌安等地失而復得，國人喜悅與作戰部隊的大事渲染，自然在所難免。可是，身居層峰的蔣介石，目睹各軍自吹自擂之景，實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與憂慮。5 月 6 日，蔣介石致電北平軍分會何應欽，特別提及：

> 此次敵兵自動撤退，本非我軍戰勝之結果，中外共知。我軍乃據為通電報捷之資料，如雪片紛飛。內長國人之虛妄，外召友邦之訕笑。致外報竟有「我國軍人太不知恥」之譏，實可痛心。應即切實糾正。一切標語、口號之政策，徒增倭寇之敵愾心，於我毫無實益，亦應概予停止撤銷。[115]

蔣介石的憂慮，乃基於他對日本軍方的認識。他意識到，進軍華北，本非日本軍方當務之急，如何確保新建的滿洲國不受中國勢力之擾，方爲日方主要的考慮。因此，日本軍方很在意中國勢力的反撲，對所謂日軍戰敗不得不撤出關內之傳言，[116]尤爲敏感。

---

115 「蔣中正電何應欽黃紹竑中央各師應相當隔離趁日軍撤退時機整頓以防全線戰事再起及以黃紹竑速赴張北統一指揮以圖恢復多倫等華北軍事要領四則並希照辦理」（1933 年 5 月 6 日），〈侵擾熱河（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200-00010-239。

116 對於傳言之誤事以及中國不能趁日本撤軍，而爭取暫時的喘息機會，行政院長汪兆銘惋惜不已，其中的曲折，汪的感觸，皆一一呈現他於 5 月 16 日致國聯中國代表團的電文，稱：「暫時休戰，兩軍設定相當距離，在四月杪，事實上在灤東方面已經作到。乃日軍撤退灤東以後，我方步驟不齊。前敵將士見日軍撤退，遂以少數部隊進駐灤東，請派縣長，而大張捷報，侈言收復。各界又不明敵情者，妄相猜測，反以爲日本內餒，故不敢進兵平津。觀察既誤，持論遂乖，日本因此遂又進攻示威。此次能否再度停戰，固未可必，而欲得此機會，必須於此大加注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分冊 2，頁 235。

（三）日軍的政治謀略

事態後續發展，證明蔣介石的判斷並非空穴來風。在蔣致電何應欽的次日，5 月 7 日，關東軍再度跨越長城，重入華北。除微調原有第 6 師團及第 8 團以外，亦增派了一個旅團及一個步兵聯隊，人數約七千六百餘人。從這些增援部隊皆納入第 6 師團編制，[117]代表此次重入華北作戰，仍是延續上次入侵灤東的路線，以求突破灤河防線拊長城之背。出兵目的，首求逼退長城沿線的中國守軍，其次圖謀瓦解華北中國軍的戰鬥力。倘有機可乘，則進一步煽起內變，分化華北。[118]

綜合觀之，長城沿線戰端之再起，自始就是有限度的軍事行動。從總兵力尚不及 3 萬，就知日本軍略所求並不高，但盼望攫取廣泛政治利益。逼退長城沿線中國守軍是軍事目的，而瓦解華北中國軍戰鬥力，則屬政治意涵。然而，這兩者界線模糊，謀求平衡點更是難題。

此中可注意的是，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於 4 月 18 日發給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的電報，提及：

> 關於動員宋哲元在北平發難之事，已與他熟議多次，現雙方已達成協議，而他也為此於下午離開北平回到前線。對於二十一日晚上（上封電報的二十日則請更正為二十一日）預定爆發的北平政變，他將會率軍趕來支持，並負責防堵中央軍從北平的逃出。為確保宋能掌握時機，落實承諾，還望貴軍動員喜峰口及飛行中隊，保持對宋軍的監視，並隨時通報渠等行蹤。
>
> 宋軍目前是部署於灤河右岸的第一線以及遵化、羅文峪、馬蘭峪之間。然若北平的政變如期發動，而宋軍卻依然固守陣地，沒有相應配合時，則煩請貴軍對渠等發射炮擊，以示警告。[119]

117 〈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機密作戰日誌抜萃〉，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41。
118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 3．日中戦争（上）》，頁 31-32。
119 《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30。

從電文可以理解，天津特務機構[120] 在板垣征四郎主持之下，活動頻繁，與宋哲元已有初步聯繫。至於何以 21 日北京沒有如期發生政變，以及是何人將主持政變，則可從以下訊息，得到解答。

首先，就前者言，4 月 20 日關東軍突然從灤東撤軍，在外援頓失的情況之下，無論是天津特務機構或是其同謀者，自然皆不便輕舉妄動。至於後者，從下列 4 月 30 日天津特務機構致關東軍參謀總長的電報，可對政變計畫的實質內涵，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 近日貴軍在古北口的驍勇善戰，再度激起反蔣派的鬥志，例如，張作相已決定配合起義，並已於 29 日命令佈防在灤東的東北軍往玉田集中後前進北平，以便在北平的張敬堯易於起事。京綏線上的第 112 師(師長張廷樞）以及孫殿英、馮占海的部隊應亦已接到往北平西北方向前進的命令。宋哲元、沈克、方振武等的部隊，也已取得會共襄盛舉的允諾。我們會評估貴軍在古北口方面的軍事進展，並利用貴軍在古北口的連勝威勢，伺機起義。萬事俱備，敬祈安心。[121]

從此電報，可理解原皖系大老張敬堯將負責北平起事。除此之外，天津軍也已聯繫位於北平東邊及西北邊前線布署的東北及西北軍系，認爲藉此布局，可一舉剷除蔣介石與張學良在河北省的勢力，進而建立親日的傀儡政權。

當 5 月 7 日關東軍再度跨越長城，重入華北後，中日兩國首先會戰於灤東地區。日軍第 6 師團向桃林、石門寨、建昌進攻，擊敗東北軍于學忠、王以哲兩部後，於 11 日強渡灤河。復次，日軍第 8 師團於 5 月 12 日突破中央軍第 2 師在新開嶺的防線，13 日進佔石匣鎮，[122]自此關內已無險可守，平津震動。

120 該機構設立於 1933 年 2 月 13 日，板垣征四郎爲首任機構長。
121 《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36。
122 《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48；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頁 124。

關東軍取得軍事上的優勢後，司令武藤信義於 5 月 15 日發表以下談話：

> 假如中國軍隊斷然並放棄從前的挑戰態度，本軍有即速開回長城線的可能，因為日本軍本務只在維持滿洲國的治安。若中國軍隊仍不改變態度，則本軍亦不得不繼續作戰。[123]

藉此談話，關東軍正式傳達軍事目的已達，惟政治議題猶待商討。至於中國方面的對應，則是全面仰仗由黃郛擔任委員長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政整會」）。新機構成立於 5 月 3 日，所具備的兩大特色，頗能反映其時的特殊背景：一爲直屬行政院，二以處理政務爲主軸。在面臨長城沿線各軍事要地相繼淪陷之際，蔣反倒以成立政務機構作爲回應，充分顯示他無意使用軍事手段抵抗，冀望藉用政治協商尋求停戰機制。惟在此期間，關東軍又於 18、19 日，再陷密雲、三河、遵化、薊縣等地，21 日更陷香河，進逼通州，距兵臨北平不及 40 里。[124]

四、黃郛崛起與政治協商

出乎意料的是，5 月 8 日張敬堯在北平被中國愛國志士暗殺，導致日本天津特務機構一時無法找到能完全俯首聽命的替代人選。而主持河北省省政的于忠漢又始終效忠國府，除導致原先商議要配合張敬堯一起行動的方振武、孫殿英等人不敢輕舉妄動外，也使得原本就持觀望態度的第 44 師以及龐炳勳、郭希鵬、宋哲元等人更是裹足不前。爲了排除障礙，天津軍特於 5 月 18 日，試圖買通守衛暗殺于忠漢，惟被于識破而未得逞。[125]在華北獨立計畫處處碰壁情況下，接納黃郛，便成爲另一不錯的選項。

---

123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 3．日中戦争（上）》，頁 37；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頁 125。

124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頁 219。

125 〈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機密作戰日誌抜萃〉，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53-554。

（一）黃郛的政通人和

黃郛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測量學校。辛亥革命期間，與同樣出身浙江，且有留日經驗的陳其美、蔣介石，於上海義結金蘭。討袁革命成功以後，黃舉家北上，定居天津，平日著書立言，關鍵時刻也曾應邀入閣出任教育部長。1924年馮玉祥發動「首都政變」，他參預戎機，事後出面組閣。北伐軍興，黃乃南下助蔣，先後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長。惟在 1928 年處理濟南事變期間，遭輿論詬病過於軟弱、失職，遂引咎辭職，自此退隱。[126]

綜上所述，黃郛具有兩大特質。首先，他與南北政要皆淵源深厚，尤其是和蔣介石有金蘭之誼，使他與層峰溝通無礙。憑藉此點，黃郛不獨能精確執行中央政府決策，亦可成爲華北地方當局與中央政府間溝通之平臺。斯時關東軍頻繁收買華北失意政客，企圖煽動內變，促使華北脫離中央。黃此次北上，不獨安撫華北政要，亦可消除中央與地方隔閡，自屬重要。其次，他不但日語流利，且精通日本事務，與日本駐華公使及武官亦有私誼，乃日本軍政界所公認「知日派」之代表。在兩國已無法透過正式外交管道化解紛爭之際，黃的第二管道，不受陳規約束，反倒較有斡旋空間。

換言之，國府於 5 月 3 日特設「政整會」，任命黃郛爲委員長，即是針對其特色所量身打造之政務機構。也就是說，對蔣介石而言，當華北形成南京中央政府、地方當局以及日本政府、日本軍部、關東軍等五方勢力相互制衡之勢時，黃郛因與五方勢力皆有淵源，乃成爲周旋於各方謀求妥協之最佳人選。

例如，正當黃郛準備北上接任新職前夕，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特意於 5 月 13 日致電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就介紹黃郛屬國府親日勢力代表之餘，更強烈表達其個人願望，亦即日本政府應全力支持黃郛，藉以調和兩國之摩擦。有吉明意見如下：

126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頁 220。本節乃生平介紹，內容採自該書第四章第二節。

> 倘若黃郛失敗，誠如他個人的肺腑之言，華北、西南等地的反蔣運動勢將應聲而起，連帶地長江流域的共軍也會死灰復燃。故此等事務不僅涉及代表知日派黃個人失勢與否，更攸關是否會導致全中國的動亂，以致無法收拾。[127]

是以，按有吉明之語，倘若黃郛不能順利完成使命，則中國必陷入內戰。國府如果崩解，將逼使日本政府提早介入華北危局。有鑒於日本當今要務，莫過於建設滿洲國，關東軍在長城線上之軍事活動，自應局限於確保滿洲國國境之安全。為此，日本勢必要借重國府親日勢力深入華北，更應趁早讓華北局勢日趨穩定，才可贏得「進可攻，退可守」之空間，方符合廟堂之算。

黃郛可得到日本駐華公使的全面肯定，乃有他人所不能及的優勢。但從下面所列的停戰線爭執示意圖（圖 3），就可知即使黃郛出面議和，也是困難重重。尤其是最終達成的協議，反而比關東軍原本要求的停戰線失地更多。其中的曲折，非可以常理判斷，只能從當時中日兩國內部皆有反和聲浪的特殊政治生態著手，才可一窺究竟。

例如不願簽協定，原本就是國府的基本立場，陳儀於 3 月起在上海與根本博進行和議協商時，所求的就是國軍主動撤離，而日軍又不追擊，讓停火得以在雙方不接戰的情況下，自動成立。可是當日軍已進軍到北平不及 40 里之處，而國軍又不可能再從北平前線撤軍的情況下，所謂雙方自動停火的客觀性，早已不存在。除了不簽停火協定已無法解決停火問題的難題外，後方的反和聲浪，對黃郛而言，自然更是障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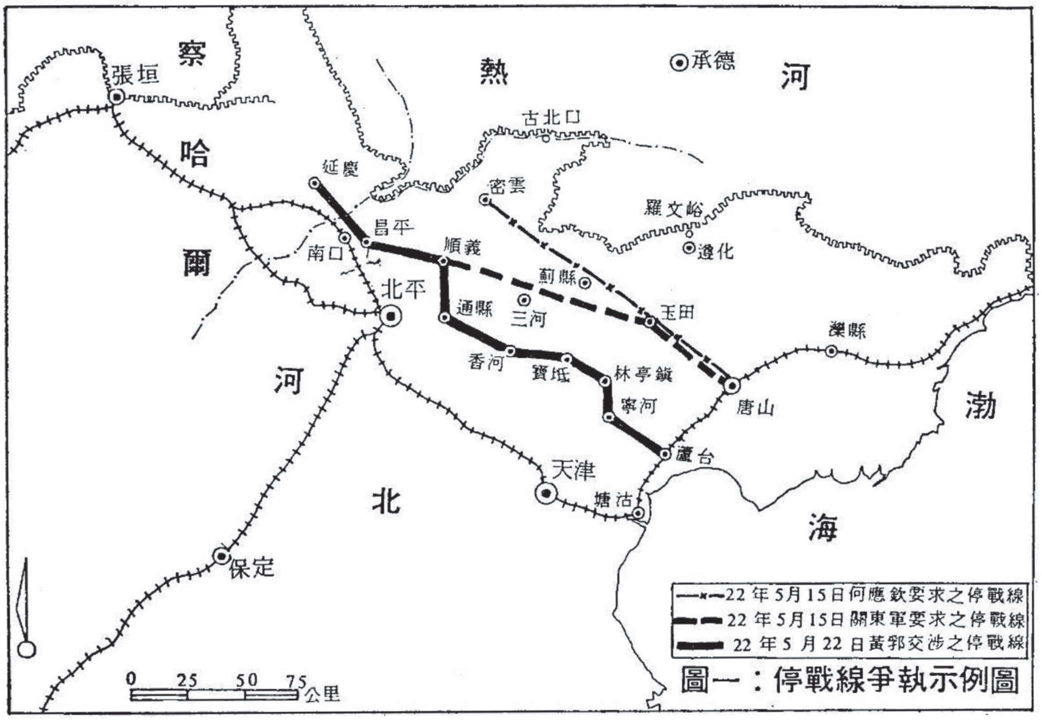
例如行政院長汪兆銘在 22 日下午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上，仍矢口否認中國有意議和。[128] 除此之外，汪於翌日向北平軍分會傳達國防會議議決的應對原則仍是：「如日本來攻平、津，我將士惟有盡力應戰，不可輕易放棄，蓋平、

127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東京：外務省，1981），《滿洲事變》，卷 3，頁 847-848。

12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3: The Far East, Vol. III*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1949), p. 343.

津情形，適與去春淞、滬相同，極繫世界之觀聽，我若示怯，從此國家人格，更不堪問，且戰爭愈烈，愈易引起各國之干涉也。」[129]

圖 3　停戰線爭執示意圖



資料來源：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84），頁 171。

在國府的主旋律仍停留在北平全面備戰情境之際，日本軍部雖因關東軍的傾向主和開始取得主導地位，但反和派仍不甘心罷手，希望持續戰事。故雙方還僵持不下。期間永津佐比重因仗恃精確掌握華北情勢，反對關東軍於 5 月 15 日所提的順義、玉田、唐山停戰線。至於他所提的順義、寶玳、蘆台停火

[129] 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委員會編，《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頁 320。

線，因可使日本軍方企圖規劃的緩衝區多擴增通縣、香河、寶坻、寧河四縣，遂於 5 月 18 日正式得到參謀本部的認可。[130]

然而在得知奉軍已潰不成軍後，永津佐比重認爲日軍還可以要求更多。因而他於 5 月 22 日提出中央軍退到保定以南，北平的衛戍部隊改由商震統率的第 32 軍進駐的新條件。[131]而與他呼應的是板垣征四郎，他於 5 月 21 日致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的電文中，將華北獨立計畫難成的原因，歸納爲以下 4 點：（1）華北欠缺足可號令眾人的中心人物；（2）反蔣派組成複雜，不易合流；（3）反蔣派並非全部隸屬於親日或親滿嫡系；（4）反蔣派過於高估南京中央政府的影響力，以致一再猶豫不決，平白誤失眾多起兵良機。尤其令人惋惜的是，原本預定 5 月 19 日趁關東軍在密雲全力剿滅中央軍嫡系第 17 軍之際，由宋哲元、方振武、孫殿英以及中央軍的第 44 師蕭之楚部揭竿而起的計畫，因兩軍並沒有在密雲決戰，第 17 軍反而順利轉進到順義，使得上述反蔣派頓失起事良機。但上述這些代表華北地方利益的派系對蔣不滿的氣息仍在，故在北平周圍再圖起事的機會尚存。復次，原預定藉由在天津暗殺省主席于學忠之便，號召原駐守該地的奉軍趁機起兵之計畫，雖因暗殺未遂，暫時作罷，但近日以張作相爲核心，再聯合榮臻、劉翼飛、王樹常等奉軍再起的計畫，仍進行順利。尤其是奉軍在灤西地區大敗後，散兵游勇皆在四處流竄，正是起義部隊可藉機收編的好時機。在陳述以上分析後，板垣的總結論是希望關東軍不要停戰，只要戰事繼續進行，他的華北謀反計畫絕對有機會落實。[132]

反映這一段不願即刻議和的現實情況，即是 5 月 20 日起日軍機在北平上空環繞飛行。[133]北平的居民爭相趨避出城，而準備擔任善後大任的黃郛，卻面臨交涉無門，無從著手的困境。原本預定於 21 日與永津佐比重會晤，卻臨時發生蒲州青年趙敬時懷利刃直撲日使館衛兵營，將日哨兵砍傷之事件。雙方不

130 〈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機密作戰日誌拔萃〉，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52。
131 〈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機密作戰日誌拔萃〉，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56。
132 〈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機密作戰日誌拔萃〉，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53-554。
133 黃郛原著，任育德主編，《黃郛日記（1933-1934）》（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頁 42。

獨不能會談，日方且堅指爲有背景有組織之行動。除趙當場被捕外，日兵隊長竟率衛兵直衝新華門質問北平軍分會，氣勢洶洶，衝突幾乎一觸即發。[134]

不過，在這黯淡一天的午後 3 時，日本駐北平的海軍武官藤原喜代間來晤，讓他「稍得線索」。[135]所謂線索應是指日本軍方內部的最新發展情勢。首先是日本參謀本部於 5 月 18 日，同意永津佐比重所提的停火線改設在順義、寶坻、蘆台線的同時，也指定關東軍可作爲簽訂停戰協定的當事者，並要求可開始籌畫停戰事宜。翌日，更對停戰協定綱目作進一步的指示，具體內容爲國軍不可再進入順義、三河、薊運河線，所有在滿洲境內的中國軍隊皆需從該國撤離，今後也不可再對滿洲國及其國境線採取任何敵對行爲。此外，爲保證中方會履行停火協定，停火協定後，日軍仍需保留對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及山海關等重要關隘的駐兵權。最後，則是希望停火協定能在北平簽定，以便更能具體呈現城下之盟的意涵。

5 月 20 日，關東軍下達停止進擊的命令。5 月 22 日，關東軍直接下令給永津佐比重，要求他負責與北平最高軍事當局斡旋停戰事宜，具體要求國軍需即刻撤退到延慶、順義、寶坻、寧河、蘆台沿線以南及以西地區，而日軍一旦確定國軍皆已遵守約定，則會自動撤軍回到長城防線。至於簽訂日期，可保持彈性，簽約地點只要在北寧線上就可。除了上述的電文外，參謀本部也於同日致電給天津的特務處，除通知他們，軍方已決定議和的新決策，也要求他們正式停止在華北所進行的謀反工作，並全面配合停戰協定。[136]

由於受史料限制，對於 22 日的日本軍方最新發展情勢，黃郛是否知曉，吾人無法斷言。但 21 日前的資訊，亦即是日本軍方已決定議和，而陸軍駐北平使館武官永津中佐則是議和的最大障礙，海軍駐北平使館武官藤原較有善意，並樂於推動議和之事，黃郛應是深有體會。

---

134 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下冊，頁 555。
135 黃郛原著，任育德主編，《黃郛日記（1933-1934）》，頁 43。
136 〈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機密作戰日誌拔萃〉，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52-555。

根據黃郛的年譜，在得知日本軍方已確定有意媾和，但未得到層峰授權前，他並沒有即刻行動。他將面臨的困惑及日軍的最新要求，前後發了兩封電報給蔣介石及汪兆銘。第一封致蔣的電報內容如下：

> 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自美國申請書發表後，日方態度驟變，既往工作盡付流水，趙敬時案又適逢其會而發生。昨晚敬之兄召集軍事會議，已決定在白河線作最後抵抗，但平津若動搖，則前在滬所商定之六百萬，事實上又成空話。財政如無新途徑以資接濟而維軍心，則全部華北情形將不知紛亂至何程度，應請中央預為注意。郛等進止，尤須請示。北平既入戰區範圍，政整會自無工作餘地，現雖尚未成立，擬至必要時即隨軍事機關轉進，或即南旋面陳經過，如何盼復。郛養。[137]

電文中透露出三點重要訊息，首先是美國申請書對他的議和活動所造成的阻礙。所謂申請書，是指美國總統羅斯福於 5 月 16 日對參與世界經濟會議的 44 國之元首發表聲明，呼籲各國縮減軍備，廢止侵略之武器，並同意制止武裝軍隊之踰越國境等行爲。[138]羅氏又於 19 日與宋子文在華盛頓發表和平宣言，其中表達了美國對遠東兩個大國之間軍事衝突早日停止的深切期盼。[139]但堅持中、日兩國事務，務必由兩國自己協商解決。對堅決反對國際勢力介入的日本政府而言，羅斯福總統的一連串發言，不僅未能緩和兩國緊張情勢，反而促使日本更欲加強對中國的壓迫，以便徹底消除中國朝野對國際社會奧援的幻想。此外，電文中還提及整頓華北經費所需 600 萬經費。[140]最後，則是北平既已淪

137 「黃郛電蔣中正日方因美國申請書態度驟變何應欽昨晚開會決議於白河之線做最後抵抗請注意華北情況及財政另政整會必要時將隨軍轉進」（1933 年 5 月 22 日），〈侵擾熱河（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200-00012-273。

138 《申報》，1933 年 5 月 18 日，第 6 版。

139 《大公報》，1933 年 5 月 21 日，第 4 版。

140 這是爲黃郛北上所特別籌措的軍費，當事者爲張壽鏞，經費來源爲將向銀行抵押的庫劵以七五折折現。此一金額，與日本情報盛傳黃郛將攜帶 500 萬鉅款北上，以求安頓北方政局的傳言，差距不大。似可解釋，黃郛何以擔憂，一旦平津淪陷，所謂庫劵折現的可能性也會緊接喪失，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重整華北的大計，自然毫無著手餘地。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

爲戰區，政整會是否還需如期成立。是以，綜合黃郛所述三點，可知其言下之意，皆是在強調議和的重要性，所謂國際奧援，類似遠水無法救急，平津能否避戰，不僅關乎政整會重整經費是否可順利籌措，也關乎政整會是否還有活動的空間。

第二封致汪的電文，內容如下：

> 南京汪院長鈞鑒；密。馬亥電奉悉。近日對方態度驟變，本晨已另電詳告，想蒙鈞閱。連日專製造小問題迫我，並無條件提出。略取平津，雖尚未必，而包圍平津，迫我接受嚴酷之條件，不可不防，現正慎重應付中。電稿未畢，聞天津日司令要求北寧路備車一列，明日要運兵五百名來平護僑。按辛丑條約，無法拒絕。敬之兄約晚間召集會議，商籌應付，附聞。郛叩養。[141]

若僅從電文內容來看，似乎平淡無奇，尤其是日方要求北寧路備車一事，其涉及的層面，更非嚴重到需要偏勞他專事向行政院長彙報的程度。而他之所以要發此電報，無非還是在催促汪對議和問題早作定奪。

北平軍分會的晚間集會，已決定以第 17 軍徐庭瑤部死守北平，其他軍政要員移住長平店。當時北平的形勢，誠如隔天上海《時報》第六版標題所刊「敵分四路圍平，景泰再現，誰作于謙？」反映輿論界均認爲除非奇蹟出現，否則北平難逃淪陷厄運。然而黃郛意外地於 5 月 23 日凌晨，與日本駐華武官達成初步停火協議。是時日軍對北平僅採合圍之勢，東面的第 6 師團主力尚留薊縣，第 8 師團主力則駐於密雲懷柔一帶，皆未繼續推進。

（二）停火協定得以底定的關鍵

至於華北當局何以從棄平津準備武力抵抗，到簽署停戰協定而委曲求全？其間曲折過程，可由黃郛於 5 月 27 日致蔣介石電文中一窺究竟：

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5），冊 20，頁 168-169；須磨彌吉郎，〈北支見聞錄〉，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頁 578。

141 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 558-559。

南昌蔣總司令勳鑒：密。有申電奉悉。停戰協定，豈兄所願？因二十一晚開軍事會議，聽各將領所表示，知危機已間不容髮。二十二晨日使館又由津增兵兩連，而前線各路急報頻來，城內反動團體復躍躍欲試，津埠暴動，相應而起，一時人心恐慌，秩序大亂，其時環境之險惡，較之當年在濟南退城時之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在平同人見大勢已去，認弟電所稱最後關頭已至，決定一面守城，一面將軍政最高人員移駐長辛店。然猶慮離平以後，華北局面，必至不堪設想，故遲遲未發。延至晚間十時，得汪院長養電略稱：欲謀停戰，須向對方問明條件。其可答應與否，弟以為除簽字於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且弟絕不聽兄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負責，乞速與敬之、季寬、岳軍諸兄切實進行等語。得電時，敬之兄正與徐軍長（庭瑤）研究城防，岳弟未在側，乃與季寬兄密商，時已深夜十一時，不容有躊躕之餘地。遂決然偕李擇一君，電約中山代辦、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會談，直至次晨二時始散。徹夜週旋，心酸膽裂，勉獲緩和，重留北平。今後談判進行，自當遵囑認定以停戰條件為範圍。偽國承認問題，雙方均非瘋狂，深信決不至涉及。蓋局部軍事長官所派之代表，其資格並不足以代表國家，何得議此種有關領土完整之政治問題？所當注意者，條款文句之間，彼等或用偷關漏稅之狡猾手段，插入滿洲國境線等之字句，為將來交涉東北問題之伏筆，此則當時時防範耳！總之，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給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載，雖不敢謂已達悲智雙修之域，然自信悲願決不至賣國，智慧決不至誤國，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針，勿為外來蠱惑之詞所矇蔽，更勿為南來不穩之消息所動搖。蓋國際援助一層，以兄平素所具之國際常識判斷，敢斷其不過一片空言，讓百步言之，其實際之援助，為時必甚迂緩，遠水不救近火，為量必甚微薄，杯水無補車薪者也。至南部情形，彼等早已決策，所謂「你東我西」，無論如何，無

可避免，惟有用種種方法，以圖應付。至尊電所謂應下最高無上之決心，以求得國人之諒解一語，則兄尤不能不辯。兩年以來，國事敗壞至此，其原因全在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無上之決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時，早已下定，無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職，弟如要兄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真實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內擾外壓，感慨萬端，神經刺亂，急不擇言，惟吾弟其諒之，並盼電復。郛叩感（廿七日）印。[142]

該電文除反映黃郛在面臨北平棄守壓力時的心路歷程，還透露兩個訊息：第一、汪兆銘及時提出簽訂停戰協定之底線以及允諾願承擔所有政治責任，[143]讓他覺得猶有與日軍斡旋之空間，是促成他義無反顧敢與日軍達成停戰協議的重要關鍵。第二、蔣介石不反對簽停戰協定，卻懼於擔負政治責任，乃不忘在處理過程中唱高調，預留自己的辯解空間。對蔣的這種態度，黃郛頗有意見。尤其蔣「最高無上的決心」之語，令黃不懌，以爲蔣陷其於不義。按中國官場文化，直陳層峰之過，乃大忌諱。爲了更清晰掌握蔣介石在簽訂停戰協定中的基本態度，以下將重新檢視蔣致黃郛的電文。

第一封電報發於 5 月 24 日，也就是蔣介石獲知協議初步達成後，予黃郛的指示：

限 2 小時到，北平居仁堂何部長、黃部長、黃委員長均鑑：漾辰電悉。密。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當負責，惟停戰而形諸文字，總以為不妥，且將來協議條款，必有種種難堪之苛求，甚或東北三省及熱河字樣，亦必雜見其中，無異割讓之承認，尤為可

142 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 564-565。

143 原電內文如次：「北平黃委員長膺白先生勛鑒：密。馬亥電計達，欲謀停戰，須向對方問明條件，由負責長官決定其可答應與否。弟以爲除簽字於承認僞滿，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且弟決不聽兄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負責。乞速與敬之、季寬、岳軍諸兄切實進行爲盼。弟兆銘養」。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 559。

慮。顧停戰協定，既非議和條約，最宜題界劃清，極力避免，此則惟賴兄等慧心運用耳。日人狡猾成性，當談判進行之際，且恐波折層出，忽軟忽硬，乍陰乍陽，極威迫誘惑之能事。尚盼趁此時機，激勵士氣，重整軍容，以備最後之犧牲為要。中正迥（廿四日）申機印。[144]

第二封電報發出日期爲 5 月 25 日，亦即北平軍分會特派代表赴密雲正式向日軍提出停戰協定之日，內容如下：

限即刻到。北平豐澤園黃委員長膺白兄：梗電敬悉。密。忍辱週旋，為國苦心，實深感佩！惟弟始終不信倭寇有休戰誠意，尤在威脅吾人使之自動撤退，俾其唾手而得北平也。至於協定一節，總須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將來引以為例，其端由吾人而開也。否則萬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過去年淞滬之協定，絕不能涉及偽國事實之承認，以及東四省之割讓與界限問題。故其內容及字句，必須加意審慎。鄙見所及，於昨覆兄等漾電業已詳述之，惟賴兄匠心獨運，使之得當耳！以後周折必多，應付甚難。故於談判時期，城防設備，尤應加緊。最高無上之決心，不可須臾或忘。弟以為不有一北平死戰，決不能滿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國人諒解也。正有申機。[145]

若僅看字面意義，蔣介石電文似乎無可指責，予人主持國家中樞、事事以國家爲念、時時準備作最後犧牲的印象。然而，倘檢視蔣當時之布局，特別是委請黃郛出面主持危局的謀算，似另有文章。蔣的表態恐怕不是提醒黃郛，用意更像是維護自己的歷史定位。黃郛之悲憤，無非是事已至此，蔣猶只顧自身，忽略他的委屈。[146]

對於《塘沽協定》，蔣介石在日記中如此記述：「昨日停戰協定，在塘沽簽字，事實上未有過，而文字實令人難堪，代表之無能，與前方之怯餒，不

144 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頁 561-562。
145 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 563。
146 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 564-565。

勝慚惶。」[147]易言之，「不滿意，但可以接受」，是蔣對協定的評價。理智上，蔣認爲協定僅是中日兩國停火協議的執行細則，不涉及承認「滿洲國」的法律問題。協定文字大抵堅守立場，蔣表示滿意。唯另一方面，蔣對條文反映出的兩國不對等地位，情緒上亦有不滿。尤其是協定第三項，不獨賦予日軍單方面監督國軍撤退之權，甚至規定中國須對監督工作提供必要協助。純就軍事觀點談，此規定意義不大，卻顯示了日軍逼簽城下之盟的凌人氣勢。由於底線未失，簽約代表無可苛責，蔣也只能在日記中抒發不滿。

蔣介石的反應、以及汪兆銘所提出的簽訂停戰協定之底線，顯示國府基本立場在於壓低協定的政治意涵，並將之定位爲臨時軍事協定。規範兩軍的停戰撤兵、隔離駐紮、保護境界等軍務細則，遂成爲協定的主要內容。

易言之，當 5 月 7 日，關東軍再度出兵華北，在軍略上設定的目標，是爲了逼退長城沿線的中國守軍，確保滿洲國的國境安全；在戰略上的目標，是煽起內變，企圖建立一個親日的傀儡政權。對於如何在華北地區建立親日勢力，參謀本部與陸軍省內部卻有路線之爭。支持黃郛，是陸軍省主張；支持張敬堯，或在華北扶植舊軍閥，是參謀本部的想法。前者以鈴本貞一爲代表；[148]後者以永田鐵山爲中心。[149]

然當東路的國軍已退出灤河，北路的國軍則退出密雲，在滿洲的國境線可高枕無憂之際，代表永田思維在華北地區具體執行政治分化活動的板垣少將卻事事無成，轉而支持黃郛，便成爲軍方內部的共識。尤其是黃郛雖素與日本外務省相善，但議和的過程中，在得到陸軍省鈴木授意之下，刻意迴避外交管道，主動與關東軍商議，[150]頗能投關東軍所好。蓋關東軍可藉此順理成章地成爲日

147 〈蔣中正日記〉，1933 年 6 月 1 日。

148 根據日本元老西園寺公望的祕書原田熊雄的記載，1933 年 6 月 2 日他向外務省詢問塘沽協定始末時，對方卻說除了簽約的形式略有調整外，其餘相關細節，皆是陸軍省軍務局的鈴木貞一中佐事先已與黃郛談妥的內容。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東京：岩波書店，1952），卷 3，頁 9。

149 須磨彌吉郎，〈北支見聞錄〉，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变》，頁 568。

150 爲爭取關東軍對他的支持，黃郛於 5 月 22 日特派殷同趕赴長春，以求和議能順利進行。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 557。

方全權代表。不惟如是，《塘沽協定》既然被定位爲兩軍前線指揮官間的權宜措施，關東軍無異取得不受君命地位，特別是將長城線以南，及延慶、順義、蘆台所連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劃爲非武裝區，規定中國不得駐軍。其次，該區之治安維持，雖容許由中國員警機關任之，但不得任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團體。最後，則賦予關東軍享有對履行協議的監督權。如此一來，不僅停戰相關事務，甚至是任何涉及華北的事務，盡皆落入關東軍管轄範圍內。影響所及，關東軍此後不僅可名正言順地拒絕日本外務省插足華北問題，即使是在東京的日本陸軍省，也因行政分層負責的約束，無法過問華北事務，只得時常接受關東軍先斬後奏的既成事實。

因《塘沽協定》能充分滿足關東軍的需求，這也是關東軍轉而支持黃郛，讓他主導議和協商，而得於 5 月 23 日凌晨達成協議之主因。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甚至爲確保協議不再生變，還於 5 月 25 日特地致電陸軍次官柳川平助中將，電稱：

> 為求在華北建立一個與國民黨毫無關聯的親日滿之政權，故擬支持黃郛達成此一願望，想必東京政府不會反對以外，滿洲國政府勢必也會支持。[151]

是以，支持黃郛，以在華北建立一個擺脫中央控制的親日政權，旋即成爲日方一致的新政策。易言之，日本政府既以穩定國內局勢爲重，唯恐軍方在中國輕啓戰端，擾亂國內憲政秩序，對黃郛主動出面求和，自然樂觀其成。[152]而日本駐華的外務系統則視黃郛爲國府的親日勢力，認爲支持他，除直接有助於改善兩國對峙的僵局外，亦可間接穩定國府的局勢，避免內戰爆發，不使中共乘機崛起。至於關東軍，亦視黃郛爲可統合華北各地方派系之親日勢力代表，支持黃郛，有望早日落實華北的獨立計畫。

151　〈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機密作戰日誌抜萃〉，收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変》，頁 558。

152　按日本元老西園寺公望的祕書原田熊雄的記載，1933 年 7 月 28 日西園寺見齋藤實總理時，總理抱怨：「大家都搶著要支持黃郛，似乎整個日本都要圍著他轉，此風眞不可長，我絕對持保留態度」，由此可見當年黃郛鋒頭之旺。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卷 3，頁 108。

當時國府對他的期許，可從下列同年 9 月 28 日蔣介石致其之電文，一窺究竟：

> 日人欲設立華北新政權，造成第二傀儡，以打擊本黨而壓服全國。此種企圖當然始終未能忘懷，其中一部日本軍人主張尤力。而我國漢奸遍地，亦在在足供其利用之資，均為共見共明之事實。故中央對日政策，既不能武力抗阻，惟有緩和侵略。一切方法及途徑迭經籌商，本已略具端倪；而負責運用之機關，則唯外交部及華北政整會是賴，然以政整會尤為密切。[153]

易言之，國府成立政整會的目的，在於藉助黃郛與日本駐華外務及軍事系統的人脈，緩和兩國對立的緊張情勢，冀望以最少代價保住中國在華北的主權。

黃郛也因各方都能接納，不僅爲中日雙方謀得於 1933 年 5 月 31 日簽署《塘沽協定》，更得以順利解決戰區的善後處理，讓政整會於 1934 年 2 月 10 日及 3 月 4 日分別接收長城內外側的山海關及古北口，促使日軍完全撤出關內。復次，又完成通車及通郵談判，前者於 1934 年 7 月 1 日，北平與瀋陽直達列車開始恢復行駛，後者則於 1934 年 12 月 14 日達成協議。[154]中國也因而得以暫時滯延了日本的侵略，並能繼續進行安內工作。

五、結　論

關東軍進軍熱河，是爲了落實滿洲國的建國目標，亦是爲了鞏固以長城爲界的國防邊界線。然時任熱河省主席的湯玉麟，未曾考慮抗敵，並一度列名關東軍主持的東北行政委員會，且署名「滿洲國宣言」。

國府未能及時解決湯玉麟，搶先部署熱河防禦，癥結在於主持華北大局的張學良與湯玉麟在經營鴉片貿易上形成共生關係。張不願輕易斷此財源。對於

153 「蔣中正電黃郛」（1933 年 9 月 28 日），〈卯翼傀儡（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90200-00019-228。

154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頁 231-233。

張無意積極擔承熱河防務，雖曾一度引起行政院長汪兆銘的辭職抗議，但將張視爲盟友的蔣介石，並不願因熱河防務問題的爭議，動搖他在華北的權力架構。在保張優先的考量下，國府並未利用關東軍正忙於在東北境內各處征伐義勇軍之際，加強熱河防務，自是導致日後熱河戰敗的樞紐。尤其是蔣介石一直認爲關東軍兵力不足，除非得到日本國內部隊增援，否則不可能輕易發動熱河戰事。因而他把重心放在催促東北軍早入熱河，認爲只要熱河防禦部署得當，就可逼使關東軍打消戰意。出乎意料的是，關東軍僅從駐滿洲國境內的五個師中抽調兩個師、一個騎兵旅團，以及臨時整編而成的一個混成旅團，在總兵力只有 18,500 人的情況下，就貿然啓動戰事。

戰術老舊、無抗敵决心以及民心背向，是熱河戰役大敗的三大主因。其中，東北義勇軍不耐陣地戰，湯玉麟軍系的陣前倒戈以及熱河民眾的開城降敵，皆在不同層面上影響戰局。然最令人詬病的是，奉命支援熱河戰事的東北軍第 57 軍萬福麟部，除在凌源前線不戰而撤，連原本要固守的後方重鎮鐵門關、董家口、喜峰口也拱手讓人。

長城保衛戰乃熱河之役的延續，主因在於關東軍將位於熱河境內的長城 7 個關口納爲滿洲國的國境線。3 月 7 日展開的長城保衛戰約可分爲：（一）長城關口纏鬥（1933.3.7~3.24）；（二）灤東作戰（1933.3.26~4.16）；（三）兵臨北平（1933.5.7~5.23）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始自 3 月 7 日，日軍第 8 師團在青石樑遭遇東北軍第 107 師伏擊時起，至 3 月 24 日，日軍第 8 師團放棄進攻冷口，暫時休兵時止。至此，長城 11 個關口中，日軍已奪據山海關、九門口、義院口、界嶺口、董家口、鐵門關、喜峰口、潘家口、古北口等 9 個關口；冷口及羅文峪等 2 個關口，則仍由國軍控制。除此之外，國軍在界嶺口、喜峰口及古北口的關口附近制高點處仍廣設陣地，兩軍持對峙之勢。

第二階段爲 3 月 26 日起，日軍放棄由熱河一帶突破長城正面作戰計畫，改由業已佔據的山海關方面切入，自 4 月 1 日突破石門寨後，東路日軍直抵北

戴河；北路日軍攻陷冷口，隨即分兵南下，在相繼攻陷遷安及昌黎後，東北軍的第 53 軍、第 57 軍、晉軍的第 32 軍以及西北軍系的第 29 軍皆撤守灤西，灤河以東區域失陷。

第三階段始自 5 月 7 日，東路日軍再度突破石門寨，於 11 日強渡灤河；北路日軍 5 月 12 日突破新開嶺的防線。5 月 21 日，東路日軍陷香河，北路日軍陷懷柔，順利完成合圍北平之勢。

從日軍將戰場自熱河轉到華北時，只增兵一萬餘人，總兵力約三萬人情況來看，華北戰役自始就是一場有限度的戰爭。日軍的目的只是確保長城國境線的絕對安寧。而蔣介石無意堅守熱河，其底線在於不能喪失河北省，也不希望華北事務阻攔他在華中地區的剿共政策。對他而言，華中地區爲他的直轄地盤，中共在華中地區的存在，直接威脅他的核心權力基礎，就此而言，剿共與保衛華中乃一體兩面。華北地區，只要主權不失，停戰協定不涉及滿洲國的主權認定，其餘皆可商議。

當日軍已達成軍事目的，原本規劃張敬堯出面主持傀儡政權的政治謀略，因張氏被殺，在日本天津特務機構一時無法找到俯首聽命的替代人選之際，黃郛因與南京政府、華北地方當局以及日本政府、日本陸軍省皆有淵源，乃成爲周旋於各方謀求妥協之最佳人選。

《塘沽協定》得以於 1933 年 5 月 31 日簽定，其關鍵在於蔣介石成立政整會，並起用黃郛，賦予他全權處理華北善後事宜。而他則得力於與日本各勢力代表皆有深厚淵源，尤其日本政府將他視爲國府之親日勢力，故而支持他，除有助於直接改善兩國對峙僵局，亦可間接幫助國府穩定時局，不僅避免內戰爆發，更不爲中共崛起創造良機。至於關東軍，則視黃郛爲可統合華北各地方派系之親日勢力代表，以期可早日落實華北獨立計畫。黃郛也因得力於駐華外務及關東軍對其這種特殊期許，不僅促成《塘沽協定》順利簽訂，也有助於日後接收戰區以及關內外通車、通郵談判的順利進行，爲國府爭取到一年八個月的戰區重建期。

華北的一時偏安，是蔣介石得以在無後顧之憂的情境之下，在江西順利推展第五次圍剿戰爭的關鍵。從此一角度，黃郛在《塘沽協定》簽訂過程中所扮演的緩衝角色，亦可謂是對蔣在籌建全國團結的「安內攘外」備戰體制過程中，有最直接的貢獻者。

徵引書目

一、檔案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案

參謀本部編，〈支那時局報：第 57 號．北支及中央／財政概史〉（1932 年 5 月），檔號：參謀本部-上海事件-S6-1-57。

國史館藏檔案

《國民政府》

〈熱河省政府官員任免（一）〉，典藏號 001-032220-00174-002。

《蔣中正總統文物》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一）〉，典藏號 002-080200-00053-117。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一年（十八）〉，典藏號 002-080200-00070-084。

〈卵翼傀儡（一）〉，典藏號 002-090200-00019-228。

〈侵擾熱河（七）〉，典藏號 002-090200-00013-395。

〈侵擾熱河（六）〉，典藏號 002-090200-00012-273。

〈侵擾熱河（四）」，典藏號 002-090200-00010-153、002-090200-00010-162、002-090200-00010-239、002-090200-00010-309。

〈革命文獻—長城戰役〉，典藏號 002-020200-00016-081。

〈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至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典藏號 002-070100-00030-011。

〈籌筆—統一時期（七十五）〉，典藏號 002-010200-00075-025。

二、史料彙編

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編，《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变》，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卷 3，東京：外務省，1981。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16，臺北：國史館，2004。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20，臺北：國史館，2005。

北平軍分會編，《長城各口之戰鬥》，北平：北平軍分會，1933。

仲摩照久編，《熱河討伐及熱河事情》，東京：新光社，1933。

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編輯委員會編，《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上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

吳淑鳳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15，臺北：國史館，2004。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冊 3、4，臺北：國史館，2014。

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
東北文化社年鑑編印處編，《東北年鑑》，瀋陽：東北文化年鑑編印處，1931。
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高明芳編註，《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冊 19，臺北：國史館，2005。
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臺北：國史館，19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灤東及長城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局，1980。
國務院統計處編，《滿洲國年鑑》，新京：川口印刷所，1933。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 3，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稲葉正夫、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11）：続．満洲事変》，東京：みすず書房，1965。
鐵道省運輸局編，《滿洲國鐵道圖》，東京：鐵道省運輸局，193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3: The Far East, Vol. III*.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1949.

三、報章雜誌

《大公報》（天津），1932-1933。
《中央日報》（南京），1933。
《申報》（上海），1932-1933。
《國聞週報》（天津），1933。
胡適，〈汪精衛與張學良〉，《獨立評論》，號 13（1932 年 8 月 14 日），頁 2-4。
蔣廷黻，〈熱河失守以後〉，《獨立評論》，號 43（1932 年 3 月 26 日），頁 2-5。

四、日記、自傳、回憶錄

〈蔣中正日記〉，1932-1933，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分冊 2，北京：中華書局，1993。
曹伯元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冊 6，合肥：安徽省教育出版社，2001。
黃郛原著，任育德主編，《黃郛日記（1933-1934）》，香港：開源書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19。

五、專著

内田尚孝，《華北事変の研究：塘沽停戦協定と華北危機下の日中関係 1932-1935》，東京：汲古書院，2006。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集，《太平洋戦争への道：開戦外交史 3．日中戦争（上）》，東京：朝日新聞社，1962。

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冊 9，臺北：中央日報，1976。
臼井勝美，《滿洲国と国際連盟》，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
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
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姜克實，《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冊 3，東京：岩波書店，1952。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
黃道炫、王希亮，《局部抗戰》，收入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卷 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
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84。

六、論文及專文

小林英夫，〈日本の「滿洲」支配と抗日運動〉，收入野沢豊、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卷 6，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8。
左雙文，〈《塘沽協定》後蔣介石的對日妥協外交〉，《廣東社會科學》，2010 年第 6 期，頁 115-122。
江紹貞，〈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貴州社會》，1984 年第 2 期，頁 65-72。
李鳳琴，〈和戰之爭與《塘沽協定》〉，《陰山學刊》，2005 年第 4 期，頁 18-23、27。
肖前，〈塘沽協定簽訂前的中日談判〉，《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頁 228-243、166。
明珠、劉春英，〈長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對日交涉〉，《長春師範學院》，2002 年第 4 期，頁 36-39。
金以林，〈論長城抗戰〉，《團結》，2005 年第 4 期，頁 15-22。
侯杰、徐開陽，〈長城抗戰與二十九軍大刀神威再審視〉，《河北學刊》，2020 年第 4 期，頁 65-74。
張金亮，〈試析《塘沽協定》的簽訂〉，《齊魯月刊》，1990 年第 3 期，頁 16-20。
黃民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輿論界對《塘沽協定》及其善後談判的反應〉，《社會科學論壇》，2017 年第 3 期，頁 70-77。
劉國新，〈《塘沽協定》與「華北自治運動」〉，《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頁 199-211。

The Rivalry in North China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nggu Truce

Huang Tzu-chin*

Abstract

The rivalry in North China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1930s largely originated from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Rehe on February 23, 1933.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ans, however, have maintaine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s to why the Japanese launched the Battle of Reh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iscursive context surrounding Japan's policy of invading China, the present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Battle of Reh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apan's Kwantung Army. Second, taking the reasons wh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ould not dismiss Chairman Tang Yulin 湯玉麟 (1871–1949) of Rehe province before the war as a research thread, it explor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1887–1975), Zhang Xueliang 張學良 (1901–2001), and Tang Yulin in North China, using this to analyz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defeat in the Battle of Rehe. Thir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ismissal of Zhang Xueliang and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deployment of the Beijing Branch Military Commission at various passes of the Great Wall, as well as discuss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ntry into North China and the struggles of the National Army at these passes. Finally, based on Chiang Kai-shek's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in the ordering of regions in terms of importance when implementing anti-Japanese aggression policies as well as 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and the Japanese armed forces'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Huang Fu 黃郛 (1883–1936), who played a buffer role, became the new balance of the leadership in North China, one which could be accepted by both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governments; moreover,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anggu Truce is analyzed, namely how it gained space and time for Chiang to prepare for war.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Huang Fu, the Tanggu Truce, the Battle of Rehe, defense of the Great Wall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